

普列漢諾夫等著

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

華北大學出版

一九四九年五月



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

# 用作的上史歷在衆羣民人

版出月五年九四九一 著等夫諾漢列普



歷在人個論”版年八四九一科斯莫據根書本  
唯證辯”版年三四九一社放解及“用作的上史  
印編冊分四第“題問本基論物唯史歷與論物

# 目次

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一)
論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	(四九)
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	(一〇一)

## 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普列漢諾夫

### (一)

已故的卡布里茨（註一）在七十年代後半期寫了理性與情感是進步的因素一文。在該文中，作者援引斯賓塞底言論，認為在人類前進運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性只起着次要的並且完全是附屬的作用。有位「可敬的社會學家」（註二）反駁卡布里茨時，對這種輕視理性的理論表示含有譏嘲意味的驚異。這位「可敬的社會學家」為理性作辯護，當然是作得正確的。但他如果不涉及卡布里茨所提出的那個問題底實質，而單只指明根本不可以和不容許這樣提出問題，那他就會作得更為正確了。須知，「因素」論本來就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它竟把社會生活中某幾方面隨便提了出來，將其看作獨立的實體，將其看作是從各個不同方面和具着程度不同的功效引導社會人類走向進步的力量。尤其因為卡布里茨把它敘述成這樣，以至不是把社會人類活動底某些部分，而是把個人意識底某些部分說成爲社會學上的特別主體，於是這個理論就顯得更加荒謬了。這真是絕頂的抽象；無法再往前進一步，因為再進一步，就會走進顯然妄誕無理，滑稽可笑的

一 2 一  
境界。這才是「可敬的社會學家」應該叫卡布里茨及其讀者們注意的地方。「可敬的社

會學家」看出卡布里茨因極力探尋歷史上統治「因素」而走進了怎樣一種抽象的迷宮時，也許會對因素論本身偶然作出一點批評的。這樣來作，當時對於我們大家都會是很有益處的。但他却沒有勝任。原來他自己也是站在這一理論底觀點上，其與卡布里茨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他具有折衷主義的傾向，所以他竟覺得一切「因素」都是同樣重要的。後來，在他攻擊辯證唯物主義的言論中，他那副頭腦底折衷主義本性更是表現得特別明顯，竟以為辯證唯物主義是爲了經濟「因素」而犧牲其他一切「因素」，並把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化爲烏有的一種學說。「可敬的社會學家」連想都沒有想到辯證唯物主義絕對排斥「因素」說，所以只有完全不能按邏輯思維的人才會認爲辯證唯物主義是替所謂無爲主義作辯護的學說。不過，應該指出，「可敬的社會學家」所犯的這個錯誤絲毫不新奇：過去有，現在有，並且大概將來很久一個時期也還會有許多人犯這種錯誤：

當唯物主義者還沒有擬定出辯證法的自然和歷史觀的時候，早已就有人責備他們傾向於「無爲主義」了。我們且不去追溯「往古」，只要指出英國一位著名學者普里斯特萊同普萊斯進行的爭論。普萊斯批評普里斯特萊學說時，硬說唯物主義與自由觀念不能相容，硬說唯物主義根本否認個人的積極作用。當時普里斯特萊會援引日常經驗來反駁過他，「我不來講我自己，雖然誰也不能說我是個最不活動的動物（am not the most torpid and lifeless of all animals）；但我要問問你：究竟還有什麼人比必然論者更富於努力追求最主要目標的思考力，積極性，力量和堅忍不拔精神呢？」普里斯特萊說這話時，是指宗

教民主派，即指當時所謂 *christian necessarians* \* 而言。我們不知道這個教派是否真像該派分子普里斯特萊所想像的那樣積極。但這點並不重要。毫無疑義，唯物主義的人類意志觀是完全能與最堅毅積極的實際行為相容的。郎松（註三）說道：『所有一切向人類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學說，都在原則上認定意志沒有力量，都否認自由而硬要世界服從宿命論。』\*\*。郎松以爲凡屬否認所謂意志自由的觀點都會走到宿命論，他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然而他終究指出了一件極值得注意的歷史事實：其實歷史告訴我們，甚至宿命論也不僅不總是妨礙堅毅實際行動，而且相反，在某些時，宿命論還是這種行動底心理上的一種必要基礎。例如在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徒比其他一切黨派都表現過更大的毅力，又如謨罕默德信徒在很短一個時期內就征服了從印度起至西班牙止的廣大地域。誰若認爲我們祇要一確信某些事變必然到來，則我們在心理上就不復能促進或阻撓這些事變的到來，那他就未免想錯了\*\*\*。

\* 十八世紀的法國人看見唯物主義與宗教信條這樣配合起來，一定會深爲驚訝。但在英國却沒有一個人覺得這種現象奇怪。普里斯特萊本人就是一個非常信奉宗教的人。真是各地有各地的風俗。

\*\* 參看法國文學史俄譯本，第一卷，第五一一頁。

\*\*\* 大家知道，依據加爾文學說，人底一切行爲都是由上帝預定了的。『*praedestinationem vocamus*

— 3 —  
*aeternum Dei decretum. quo apud se constitutum habuit, quod de uno quaque homine fieri vellet.* (『我們



這裏一切都要依我自己的活動是否為必然事變鎖鍊中必要的一環為轉移。如果「是」的話，那我的猶豫就會更少，我的動作也就會更加堅決。這是毫不足怪的：當我們說某人認為自己的活動是必然事變鎖鍊中必要的一環的時候，那就是說，缺乏意志自由在他看來是等於完全不能無所動作，這種缺乏意志自由在他的意識中所引起的反映是認為不能不如他所作的那樣去作。這便是可以用路德底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來表示的一種心理，人們具有這種心理，就會表現出簡直不可遏止的毅力，作出絕頂驚人的功業。哈姆列特根本沒有這種心理，所以他始終只能呻吟叫苦，只能反省直覺。因此，哈姆列特也就始終忍耐不了那認為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的哲學。費希特說得對：「有怎樣一個人，也就會有怎樣一種哲學」。

所謂預定，是指上帝底意旨而言，上帝憑其意旨所規定的一切都是必然要對合個人發生效力的。——譯者 (Augustine, *Ib.* III, cap 5.)。同時，依據這個學說，上帝從他的侍衆中挑選出幾個人去解救那些受無理壓迫的人民。救出猶太人的那個莫依斯就是這樣的人物。克倫威爾大概也自認為是上帝底這種工具；他始終，並且想必是很誠摯地稱自己的行動為上帝意旨底產物。他自己認為所有這一切行動都是預先決定了的必然的結果。但這不僅沒有妨礙他趨向於一勝再勝，並且還使他這種趨向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

\*「我既站在這個地位上，也就不能不要這樣作」。——譯者。

我·國·有·些·人·聽·信·了·史·達·木·萊·爾·(註四)·底·意·見·，·以·為·西·歐·有·一·種·社·會·政·治·學·說·似·乎·含·有·不·可·解·決·的·矛·盾·。·我·們·所·指·的·就·是·關·於·月·蝕·的·那·個·有·名·的·例·子·。·其·實·這·個·例·子·是·再·無·聊·沒·有·了·。·在·月·蝕·所·必·需·的·種·種·條·件·中·，·人·底·活·動·無·論·如·何·也·不·包·括·在·內·，·並·且·也·不·能·包·括·在·內·。·單·就·這·點·來·看·，·已·可·知·道·只·有·在·瘋·人·院·裏·才·能·產·生·出·一·個·促·成·月·蝕·的·政·黨·。·退·一·步·說·。·就·假·定·人·類·的·活·動·能·包·括·在·上·述·條·件·中·去·，·但·凡·屬·很·想·看·見·月·蝕·而·又·確·信·這·種·現·象·不·用·他·們·幫·助·也·必·然·會·發·生·的·人·終·究·是·不·會·加·入·月·蝕·黨·的·。·在·這·種·場·合·，·他·們·的·「無·為·主·義」·就·會·只·是·拒·絕·去·作·無·謂·的·事·情·，·即·是·拒·絕·去·幹·無·益·的·動·作·，·而·與·真·正·的·無·為·主·義·毫·不·相·干·。·為·了·使·這·個·月·蝕·例·子·不·是·一·種·毫·無·意·思·的·事·情·，·那·末·月·蝕·黨·就·得·把·這·個·例·子·完·全·改·變·過·來·。·那·時·就·要·設·想·月·亮·是·個·有·意·識·的·東·西·，·認·為·月·亮·覺·得·它·受·蝕·時·在·天·空·中·所·佔·的·位·置·是·其·意·志·自·決·的·結·果·，·這·個·位·置·不·僅·使·它·感·到·極·大·的·快·樂·，·並·且·是·為·使·它·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所·絕·對·必·需·的·，·因·此·它·總·是·力·求·站·在·這·個·位·置·上·\*·。·這·樣·設·想·以·後·，·就·會·要·自·問·一·下·：·當·月·亮·終·究·發·覺·原·來·並·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決·定·它·在·天·空·中·的·運·動·，·反·而·是·它·的·運·動·決·定·它·的·意·志·及·其·「理·想」·的·時·候·，·那·它·又·會·作·何·感·想·呢·。·照·史·達·木·萊·爾·底·意·見·說·來·，·當·月·亮·一·發·覺·這·點·時·，·那·它·除·非·用·某·種·邏

\*C'est comme si l'aiguille aimantée prenait plaisir de se tourner vers le nord car elle croirait tou-

輯上的矛盾想法來解脫這種窘境，就會不能運動了。但這種假定是毫無根據的。這樣一種發覺，也許會成爲使月亮心情懊喪，使其「理想」與機械現實發生矛盾的一種正式根據。但我們既已假定「月亮底精神狀態」歸根到底完全是由它的運動來決定，於是我們也就要在它的運動中去探求那些使它精神失調的原因。如果我們留心來觀察事情，那我們也許能看出，當月亮處在遠點時，它是以其意志不自由爲憾的，而當它處在近點時，它却又會覺得這是使它精神爽健的新的正式根據了。也許結果恰巧相反；也許它不是在近點，而是在遠點能找到使自由與必然互相融洽的機會。但是無論如何，這樣互相融洽總是完全可能的；必然的認識是完全能同最堅毅的實際行動相融洽的。至少迄今歷史上的情形常是如此。否認意志自由的人，往往要比其一切同代人都有更堅強的意志，並且對於自己意志的要求也最大。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種例子是人所共知的。只有故意不願意看見真正歷史現實的人，才會如史達木萊爾那樣忘記這種例子。例如，我國主觀主義者和德國某些庸人就是極不願意看見真正歷史現實的。但庸人和主觀主義者並不是人，而是如柏林斯基（註五）所說一樣不過是些幻影罷了。

*rien indépendamment de quelque autre cause, ne s'apercevant pas des mouvements insensibles de lamatière magnétique? Leibniz, Théodicée, Lausanne MDCCCLX, p. 598. (「這恰好似磁針沒有發覺磁性底作用，以爲它是自行轉動，根本不受任何原因所決定，因其向北方轉動而感到快樂一樣。」見萊布尼茨所著精神論一書。——譯者)*

現在我們來仔細看看一個人覺得自己的——過去的，現時的或將來的——動作完全是必然性結果的那種場合吧。我們已經說過，在這種場合，一個人既如拿破崙那樣自認是替天行道的使者，或如謨罕默德那樣自認是不可逃避的天運所選定的人物，或如十九世紀的某些社會活動家那樣自認是代表着不可遏止的歷史運動力量的人物，那他就會表現出幾乎是自發式的強大意志力量，把大大小小的哈姆列特所築成的那些當前障礙盡行掃除\*，好像疾風掃敗葉一般。但是，我們感覺興趣的是這種情形底另一方面，即是如下這一方面。當我認爲我的意志不自由只是表明我主觀上和客觀上完全不能不如我作的那樣去作時，當我瞭解我的這種動作也就是各種可能動作中最合我的心願的動作時，那我就會認爲必然性是與自由同一，自由是與必然性同一的，於是我不自由的地方就會只在我不能違反自由與必然性的同一，只在我不能使二者彼此對立，不能覺到我自己受必然性所拘束。然而這樣缺乏自由，也正是表明有極完備的自由。

琴梅爾(註六)說過，自由始終是意味着不受某種拘束，自由若不瞭解成爲與拘束相

\*讓我們再舉一個例子來具體證明這種人底情感何等強烈。菲拉爾公主萊奈(法王路易十二底女兒)在她致教師加爾文的信中寫道：「我當然沒有忘記你所寫給我的那些話：達維得對上帝底敵人懷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自己也始終不會持另一種態度；要是我知道皇帝，即我的父親，皇后，即我的母親，以及我已故的丈夫(Feu monsieur mon mari)和我親生的兒女是爲上帝所摒棄了的話，那我就會對他們懷不共戴天的仇恨，惟願他們落入地獄」等等，懷有這種情感的人，該能表現出何等巨大而堅強的毅力啊！而這些人都是否認意志自由的哩。

反，那自由就沒有什麼意思了。這話當然說得不錯。但是，決不能根據這種細微粗淺的真理來推翻哲學思想所作出的一種最英明的發現，即認為自由是已被意識到了的必然性這一原理。琴梅爾所下的定義太狹了，這一定義只能是指不受外部拘束的那種自由而言。當我們還只講到這樣的拘束時，若把自由與必然性看作同一個東西，那就可笑已極了：一個想從你的衣袋中偷去新手帕的小偷遇到你的抵抗而又還沒有用某種辦法打破你這種抵抗的時候，當然是不能自由偷去你這個手帕的。但是除了這種粗淺的自由觀之外，還有一種比這深刻得無比的自由觀。沒有哲學思想的人是根本不知道有這種自由觀的，而且具有哲學思想的人，也只有已經擺脫二元論並瞭解主體與客體間根本沒有二元論者所設想的那種不可逾越的界限時，才能領會到這種自由觀。

俄國主觀主義者（註七）用其烏托邦理想來同我國資本主義的現實相對立，並且不能超過這種對立一步。主觀主義者陷進了二元論的泥潭。那些所謂俄國「門徒」（註八）底理想，其近似資本主義現實的程度是比主觀主義者底理想少得不可計量的。雖然如此，但這些「門徒」畢竟找到了把理想與現實連接起來的橋樑。「門徒」底見解提到一元論了。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是走向於本身的否定，因而使他們——俄國「門徒」，並且不只是俄國「門徒」——所提出的理想見諸實現。這是歷史的必然性。「門徒」就是充當着實現這種必然性的一種工具，並且他們由於自身所處的社會地位以及因這種地位所造成的理智和道義性格，也不能不充當這種工具。這也是必然性的方

面。既然他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具有這種性格而不是具有別種性格，於是他們也就不僅充當實現必然性的工具，不僅不能不充當這種工具，而且很願意，並且不能不願意充當這種工具。這就是自由的方面，並且這種自由是從必然性中生長起來的，更正確點說，是與必然性同一的自由，是變成了自由的必然性\*。這樣的自由也是免除某種拘束的自由；它也是與某種約束對立的：深刻的定義並不推翻粗淺的定義，它補充着粗淺的定義而將其包括進去。既然如此，那末究竟還可談到什麼拘束，什麼約束呢？顯然，這裏只可談到尚未擺脫二元論的那些人底毅力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拘束；只能談到不知應怎樣把理想與現實連接起來的那些人所受到的約束。當一個人還沒有用哲學思想上的英勇努力爭得這種自由時，也當然還不能完全自作主張，不能不因遇見那種與他對立的外部必然性而在精神上感到可恥的苦痛。可是當他一旦擺脫這種苦惱和可恥的拘束重壓，而他的自由活動已成爲必然性底自覺和自由表現時，那他就會獲得他從來所不知道的一種嶄新的完滿的生命了\*\*。那時，他就會成爲偉大的社會力量，世上沒有什麼東西能阻礙

\* Die Notwendigkeit wird nicht dadurch zur Freiheit, dass sie verschwindet, sondern dass nur ihre noch innere Identität manifestiert wird” [必然性之所以變成爲自由，並不是因爲必然性已歸於消失，而祇是因爲它的那種暫時還具內在的同一性表現出來……]——譯者)。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Nürnberg, 1816, Zweites Buch, S. 281。

9  
\* 這位老黑格爾在另一個地方又卓絕地說過：“Die Freiheit ist dies, Nichts zu wollen als sich” [自由不過是個人本身的確立而已]——譯者)。 Werke, B. 12, S. 98.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他，而且沒有什麼東西會阻住他如

天雷神電

轟擊妖邪：

(III)

再重複說一遍：對於某種現象絕對必然性的認識，只能加強每一同情此種現象並認為自己是引起此種現象的一種力量的個人底毅力。如果這樣一個人認識了該現象底必然性以後却竟袖手旁觀，那就只是表明他不懂得算術而已。例如，我們假定說某種條件總和S具備時，現象A就會必然要發生。你已經給我證明，這個總和中的一部分已經具備，另一部分到T時就會具備的。於是同情於A現象的我知道了這點，便贊歎道：「妙極了！」，說罷便鼾睡起來，一直睡到你所預測的那個事變到來的那個吉日良辰為止。結果會怎樣呢？結果就會是如下述：在你的計算中，在現象A發生所必需的條件總和S中，本來是把我的動作也包括在內的，——假定我的動作是等於a。但因為我鼾睡去了，於是在T時所有促進這一現象發生的條件總和就不會是S，而是S-a，結果當然會使情形有所改變的。也許那時忽然有另一個人來替代我，此人本來也是近於無所作為，不過幸虧他因看見我消極冷淡得太豈有此理而有所感慨。於是，力量a就會由力量b所替代，而如果a等於b（a=b），那末促進現象A發生的條件總和就會仍然是等於S，而現象A也就會終究是在T時發生。

但是假如不能認爲我的力量是等於零，假如我是個靈巧能幹的工作者，假如沒有什麼人來替代我，那就不會有完整的總和S，而現象A也就會發生得比我們所預料的遲些，或是不會發生得如像我們所期待的那樣完滿，或是甚至完全不會發生。這是個非常明顯的道理，如果我不明白這個道理，却竟以爲在我叛變以後，S仍然是S，那就只是因爲我不會計算而已。然而是否只有我一個人不會計算呢？你會預告過我說在T時一定會有總和S，而你却没有料想到我同你談話後就立刻跑去睡覺了；你竟確認我始終是個很好的工作者；你竟把不很可靠的力量看成了很可靠的力量。可見，你也計算錯了。但是，我們就假定你絲毫也沒有弄錯，而是把一切都考慮到了吧。那末你的計算就會是如下述：你本來是說在T時總和S就會具備的。這個條件總和中包括有一個負數，即我的叛變；同時這中間還包括有一個正數，即意志堅強的人因確信其意向和理想是客觀必然性底主觀表現而發生的那種努力工作精神。在這種場合，總和S就會真正在你所預料的那個時刻具備，而現象A也就會真正按時發生。這大概是很明白的了。既然這很明白，那末究竟爲什麼我竟會因想念到現象A必不可免而感覺慌張呢？爲什麼我會覺得這種必然性注定要我無所作爲呢？爲什麼我談論這種必然性時，竟會把最簡單的算術法則忘記了呢？大概是因爲我所受的那種特殊教育養成了我這種極想無所作爲的癖性，而同你進行的談話又使我這種劣根性一觸即發。不過如此而已。對於必然性的認識在這裏不過是成了我這種頹唐卑劣習性藉以暴露出來的緣由。要把它當作造成我這種頹唐習性的原因是絕對不可能的；原因並不是對於必然性的認識，而是我受到的那種特殊教



育。由此可見……由此可見，算術原來是一門非常可敬和十分有益的科學，它的法則甚至至是哲學家先生，甚至特別是哲學家先生不應忘記的哩。

若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對某種現象的發生不表同情，並設法加以阻撓，那末他對這種現象必然性的認識，又會怎樣影響到他的行為呢？這裏的情形就有點不同了。這種認識也許會使他的反抗力量減弱下去。但是反對某種現象的人要到什麼時候才會信服這種現象的必然性呢？只有當促成這種現象的條件已經很多而且很強大的時候。反對這種現象的人們對於這一現象到來的必然性的認識，以及他們反抗力量的衰落，這都不過是表現出促使該現象發生的種種條件強大有力罷了。這種表現，也要算是促使該現象發生的一種條件。

然而，並不是所有反對該現象的人都會減弱其進行反抗的努力。其中有些人恰好會因認識到此一現象的必然性而加緊進行反抗，以至於拚命掙扎。在一般歷史上，尤其是在俄國歷史上有過不少表明這種拚命掙扎而值得玩味的例子。這種例子想必讀者自己也能够記憶起來，無須我們來妄費唇舌吧。

說到這裏，卡列夫先生就來打斷我們的話，他雖則當然不贊成我們對於自由與必然性的觀點，並且不贊同我們偏袒意志堅強分子「極端主張」的態度，但他終究以在我們雜誌上讀到我們認為個人能成爲偉大社會力量的這種意見而感到滿意。這位可敬的教授先生高興地喟然感歎道：「我向來都是這樣說的呀！」這話倒也正確。卡列夫以及所有的主觀主義者，確實是向來都認為個人在歷史上有極大的作用。曾經有過一個時

期，他們是因這樣主張而博得過一班先進青年方面很大的同情的，這班青年極力想從事裨益於社會的高尚勞作，所以自然極爲重視個人倡導精神底作用。但是老實說來，主觀主義者不僅始終沒能解決，甚至沒能正確提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他們把「有批評頭腦的個人底動作」與社會歷史運動規律底影響對立了起來，因而創造出了一種似乎新穎的因素論：有批評頭腦的個人是社會歷史運動底一種因素，這個運動本身的規律則是它的另一種因素。由此就得出了一種極不合理的觀念，這種觀念祇有當那些積極的「個人」還專心致志於實際迫切問題，因而無暇研究哲學問題的時候，才勉強可以使人認爲滿意。而當八十年代到來的沉寂時期已使那些有思想頭腦的人獲得一種出乎心願之外的閑暇功夫來從事哲學思考的時候，於是主觀主義者底學說便顯得破綻百出，甚至好像阿卡吉、阿卡吉也維奇（註九）那件鼎鼎大名的外套一樣根本破襤了。無論怎樣修補也補不成功了，於是有思想頭腦的人就相繼棄絕了主觀主義這個分明全無根據的學說。但是，正如一般在此種場合所常見的情形那樣，這一學說所引起的反感竟使某些反對這一學說的人走到了另一極端。如果說某些主觀主義者因力求拚命抬高「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認人類歷史運動是規律性的過程，那末現代某些反對主觀主義者的人却就因力求拚命強調這種運動底規律性而顯然決意要把歷史是由人所創造，因此個人底活動在歷史上不能不發生作用這一原理置之腦後了。他們把個人看成是 *quantité négative*。這種理論上的極端性是與極熱烈的主觀主義者所犯的那種極端性同樣不容寬恕的。爲了反題而忘掉正題，也如爲了正題而忘掉反題一樣，同樣是沒有根據的。我們

只有把正題與反題中間所包括的真理成分統一成爲一個合題的時候，才能得出正確的觀點來\*\*。

(四)

這個任務早已就使我們感到興趣，因此我們早已就想請讀者來同我們一塊解決這個任務。但我們因有一些顧慮而沒敢這樣作：我們總以爲也許我們的讀者自己已經解決了這個任務，因而我們的提議未免太遲了。但現在我們已經沒有這種顧慮了。德國史學家已經替我們打消了這種顧慮。這是真情實話。原來最近一個時期在德國史學家中間發生了關於偉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的激烈爭論。有的認爲偉人底政治活動是歷史發展中主要和幾乎是唯一的原動力，有的却又認爲這是種片面觀點，說歷史科學不僅應當注意到偉人底活動與政治歷史，並且要注意到全部歷史生活（das Ganze des geschichtlichen Lebens）。蘭普勒赫特（註一〇）就是後一學派中的一分子，他著有德國民族史一書，此書已由尼古拉也夫先生譯成了俄文。反對蘭普勒赫特的人責備他是個「集產主義者」，是個唯

\* 「值不得注意的東西」。——譯者。

\*\* 在追求合題方面，卡列夫也搶過了我們。只是可惜他沒有超出人是靈魂和肉體所構成的這個真理範圍一步。

物主義者，甚至把他——horrible dicta!——同「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神論者」混爲一談，如他自己在爭論結語中所說過的那樣。我們認識了他的觀點以後，才知道人們加予這位可憐學者的種種罪名，都是毫無根據的。同時我們又知道了現代德國史學家沒有能力解決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於是我們就認爲我們有權來設想，這個問題對於某些俄國讀者也是至今尚未解決，因此現在關於這個問題也還可以說一點並非全無理論和實踐價值的話。

蘭普勒赫特蒐集了一大批（eine artige Sammlung，據他自己說）國家英俊人物自己對於自己活動與其所處歷史環境間的關係的見解；但他在爭論中，暫時還只援引過傅·斯麥所發表的某些演說和意見。他引證了鐵血宰相於一八六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北德議會中所說的如下一段話：「諸位，我們既不能忽視已往，也不能創造未來。有人常將自己的錶針移前一些，以爲這樣就能把時間加快，但這實在是一種錯誤，我希望諸位加以避免。一般人通常過分估計了我對於我所依靠的那些事變的影響，可是始終沒有一個人想到要我來創造歷史。這種任務是我同諸位聯合起來行動也辦不到的，雖說我們聯合起來便能與全世界相抗。然而我們畢竟不能創造歷史；我們應等候歷史去自行造成。我們用火來溫暖菓樹，決不能加速菓子成熟的過程；我們把尚未成熟的菓子摘下來，是只會妨

礙菓子成長而使其腐壞的。」然後，蘭普勒赫特又根據紹里所作記述引錄了俾斯麥在普法戰爭時期說過多次的意見。這種意見大體上也還是說：「我們不能創造偉大的歷史事變，而應當適應自然進程，只能設法享受已經成熟的果實。」蘭普勒赫特認為這是個深刻而週備的真理。在他看來，現代的史學家若不局限於很短一段時間而去探索事變遠因，便不會有另外一種想法。俾斯麥不能把德國拉回到自然經濟時代去呢？這是他在他威勢最高的時候也做不到的。一般的歷史條件，要比任何意志堅強的個人更為強大。偉大人物所處時代底一般性質對於偉大人物是種「實在的必然性」。

蘭普勒赫特底意見就是如此，他把自己的觀點稱為萬有史觀。這個「萬有」史觀底弱點，是不難發現的。他所援引的俾斯麥意見是很有趣味的一種心理證據。對於前德國宰相底活動儘可不表同情，可是決不能說他這種活動渺不足道，決不能說俾斯麥是個帶有「無為主義」色彩的人。拉薩爾論到俾斯麥的時候說過：「反動勢力底僕役並不僅長於談吐，但我們很希望進步勢力能多有這樣的僕役」。這樣一個往往表現過真正鋼鐵般意志的人竟也自認為完全無力違反客觀自然進程，因為他大概認為自己不過是歷史發展底一種工具哩；這件事實又告訴我們，一個根據必然觀來看待現象的人，同時又可能是個意志很堅強的活動家哩。但也只有在這一點上，俾斯麥底意見才值得注意，若要用他這種意見來回答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却就絕對不行了。據俾斯麥所說，事變是自行造成的，我們只能設法享受事變所預備好了的東西。但是，每次「設法享受」的舉動也是一種歷史事變；這種事變與那些自行造成的事變究竟有何區別呢？其實，幾乎每一

次歷史事變一方面既是某人「設法享受」先前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果實，同時又是預備未來果實的那些事變鎖鍊中的一環。試問怎樣可以把「設法享受」的舉動與自然的進程對立起來呢？俾斯麥底意思大概是要想說，在歷史上活動的個人或集團從來不是，而且將來也永遠不會是萬能的。這點當然絲毫也不容疑義。但我們畢竟想要知道：他們的力量——固然是遠非萬能的力量——究竟要依什麼為轉移；這種力量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會增長起來，在什麼情況下又會減少下去呢？對於這些問題，無論俾斯麥自己，亦無論那位援引俾斯麥言論的博學的「萬有」史觀者，都是沒有給予一個回答的。

誠然，我們在蘭普勒赫特那裏也可讀到一些較為值得玩味的引證\*。例如，他從法國現代史學界最大權威之一的莫諾作品中引證過如下一段話：「史學家太習慣於專門注意那些燦爛響亮曇花一現的人類活動表現，注意偉大的事變和偉大的人物，却不願說明經濟條件和社會制度偉大而緩慢的運動，這種經濟條件和社會制度正是人類發展中真正重要而非暫時性質的部分，——這一部分在某種程度內是可以歸結為一種法則，並且在相當程度上還可拿來確切分析的。須知，偉大事變和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兩者在這個發展中各種情況底符號和象徵。至於大多數所謂歷史事變，則它們對於真正歷史，也好像海面的波浪對於來潮和退潮底深邃經常運動一樣，是根本不關重要的；波浪

\*我們在此地且不說及蘭普勒赫特的其他哲學歷史論文，而始終只是講到他的論文“Der Ausgang des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Kampfes” “Die Zukunft”, 1897, No 44.

發生，一時光彩燦爛奪目，隨後一觸着沙岸，就會被擊破，不會留下任何痕跡的。『蘭普勒赫特聲明，說他對於莫諾這段話中每一句話都極表贊同。大家知道，德國學者是不愛贊同法國學者，而法國學者也是不愛贊同德國學者的。因此，比國史學家皮萊恩就在“*Revue historique*”上興高采烈地強調了莫諾底歷史觀點與蘭普勒赫特底歷史觀點這樣吻合的事實。他說：「這樣一種吻合極爲重要，因爲它證明新的歷史觀點顯然有遠大的前途。」

### (五)

我們可不能對皮萊恩所持這種愜意願望表示贊同。模糊曖昧的觀點決不會有什麼遠大的前途，而莫諾，尤其是蘭普勒赫特底觀點，却正是這樣的觀點。把研究社會制度和經濟條件當作歷史科學主要任務的學派，當然應該受到歡迎。當這個學派在歷史科學中最終鞏固時，歷史科學就會獲得長足的進步。但是，第一，皮萊恩把這個學派當作新學派看待，是未免錯誤了的。歷史科學中這一學派早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就已經產生了：基佐，米尼厄，梯葉里（註一一），以及後來的多克維爾等人，便是這個學派中卓越一貫的代表人物。莫諾與蘭普勒赫特底觀點，不過是從一個老舊而頗爲光輝的藍本上模印下來的一種模糊的抄本罷了。第二，基佐，米尼厄及其他法國史學家底觀點在當時雖然可算深刻，但它中間總還有許多東西沒弄清楚。其中對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沒有給予一個確切圓滿的回答。然而歷史學家如果真要擺脫其對於本門科學的片面觀點，那

末歷史科學確實是應該解決這個問題的。只有對這個問題也能給予一個最好答案的學派，才是具有遠大前途的學派。

基佐，米尼厄以及該派其他史學家底觀點是十八世紀的歷史觀點所引起的一種反應，是十八世紀的歷史觀點底反題。十八世紀研究歷史哲學的人把一切都歸因於個人底自覺活動。誠然，當時也有過一些越出一般規律的例外：例如，韋科，孟德斯鳩或赫得爾（註一一）底哲學歷史眼界，就要廣大得多。但我們現在所講的並不是這種例外；至於十八世紀的絕大多數思想家，却是正如我們所說過的那樣去觀察歷史的。就這一點來說，現在把例如馬布里（註一二）這樣一位史學家底作品閱覽一下，是很有趣味的。據馬布里所說，克里特島人底社會政治生活和風俗是由邁諾斯一手造成，李庫爾對於斯巴爾特的貢獻也是如此。斯巴爾特人之「鄙薄」過物質財富，完全應歸功於李庫爾，因為他「深深鑽進到同胞們底心坎裏去壓倒了貪財心理之芽」*Œuvres complètes de l'abbé de Mably, Londres 1789, tome quatrième, p. 3, 14—22, 34 et 192\**。而斯巴爾特人後來離開英明李庫爾指點給他們的這條道路，却應歸罪於來山特，因為來山特居然叫他們相信「新時代和新環境要求他們採取新規則和新政策」\*。用這種觀點所寫成的作品，實在與科學作品很少相干，不過是專為引伸出一些所謂道德「教訓」而寫述的一種

\* 參看 (descendit pour ainsi dire jusque dans le fond du cœur des citoyens etc.)。

\*\* 參看同書，第一〇九頁。



教義罷了。復辟時代法國史學家毅然反對的正是這種觀點。有了十八世紀末葉驚天動地的事變以後，已經絕對不能設想歷史是某些較為傑出人物或較為高尚開明的人物所一手作成的事情，以為他們能夠隨心所欲，用某種情感和觀念去訓示那些沒有知識而又唯命是聽的民衆了。況且，這種歷史哲學又還激怒了資產階級理論家底平民自尊心理。這裏可以看出早在十八世紀資產階級戲劇發生時期就已經表露出來的那種情感。梯葉里在反對舊的歷史觀點時，又還運用過波馬什等人所提出來反對舊時審美觀的那些論據\*。

末了，法國不久前所經歷過的風暴時期，又很明顯地證明了歷史事變進程決非只是由人們自覺的行爲所決定；單是這一情況已不免要叫人想到，此種事變是在一種隱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發勢力那樣盲目而又依照某些不可變移規律動作的必然原因影響下發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實，——雖然我們知道，這件事實在先誰也沒有指出過，——

是把歷史看作一個規律性過程的這種新觀點已由復辟時代的法國史學家在論述法國革命的著作中最為澈底地發揮過了。例如，米尼厄和梯也爾（註一四）兩人底著作就是明證。莎托布里翁把新的歷史學派稱爲宿命論派。他論述這個學派所提出的研究任務時說道：「這種學說要求史學家論述最殘忍的暴行時不表憤慨，說到最高尚的德行時不表愛感，要用冰冷的眼光觀察社會生活，認爲社會生活不過是不可抵抗的規律底表現，這種

\*請參論法國歷史的第一封信與波馬什所著 *Œuvres complètes* 第一卷中的 "Essai sur le genre

規律使一切現象都正如它們所必然要發生的那樣發生\*。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新學派並沒有要求歷史家持冷眼觀察態度。梯葉里甚至坦白地說過，政治熱情磨研着研究者底頭腦，能成爲發現真理的強有力手段\*\*。所以只要稍微看看基佐，梯葉里或米尼厄底歷史作品，就可知道他們熱烈贊助過資產階級反對俗家與宗教貴族的鬥爭，以及資產階級打破新興無產階級要求的企圖。然而有一件事實是不容爭辯的，這就是新的歷史學派是發生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當時貴族雖然還企圖恢復某些舊有特權，但它已被資產階級打敗了。在新學派史學家們所有一切議論中都反映出他們的階級以獲勝自豪的意識。既然資產階級從來未曾有過騎士氣概，所以從它那些有學問的代表人物底議論中往往可以窺見殘忍對待被戰勝者的態度。基佐在他的一本辯論的小冊子中說過，“Le 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cela est de droit?”（弱肉強食，理所固然）。它對工人階級也持着同樣殘忍的態度。這種殘忍態度有時竟表現成爲冷酷眼色，因而就使莎托布里翁走入迷途。此外，當時還不完全明白究竟應該怎樣來瞭解歷史運動規律性。末了，新學派之所以竟能使人覺得它是個宿命論派，乃是因爲它力求堅決主張規律觀，而很少注意

\**Œuvres complètes de Chateaubriand*, Paris 1860, t. VII, p. 58. 此外還請讀者注意下面一頁；

這一頁簡直令人覺得是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執筆寫成的。

\*\*參看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附錄於“*Ré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 Paris

到偉大歷史人物\*。受過十八世紀歷史思想薰陶的人，當然很難容忍這種觀點。所以，新史學家也就受到各方面紛至沓來的反駁，因而發生了我們已經說過的至今尚未結束的那種爭論。

一八二六年一月，聖畢夫在“Globe”上論及當時出版的梯葉里所著法國革命史第五第六兩卷時寫道：「一個人物隨時都能依其意志底突然決定，對事變行程添加一種意外而可能變化的力量，這種力量能使事變行程變更方向，但這種力量本身却是不可測量的，因為它是可能變化的。」

決不要以為聖畢夫會認定人類意志底「突然決定」是種毫無原因的現象。這樣設想是未免太幼稚了的。他只認定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發生較為重大作用的那些智慧上道義上的特性，即材能，知識，堅決或猶豫，勇敢或胆怯等等，不能不對事變進程和結局發生

\*聖畢夫（註一五）在其評論米尼厄所著法國革命史第三版的一文中，把這位史學家對人物的態度評述如下：“À la vue des vases et profonds émoions populaires qu'il avoit à décrire, au spectacle de l'impissance et du néant où tombent les plus sublimes génies, les vertus les plus saintes, alors que les masses se soulèvent, il s'est pris de pitié pour les individus, n'a vu en eux pris isolément que faiblesse et ne le vit a reconnu d'action efficace, que dans leur union avec la multitude”。「當他看見他所必須記述的那些廣大深入的民變時，他眼看那些最高尚的聖哲和最純潔的善人在民衆起義的場合顯得毫無辦法和毫無力量，便不禁爲之傷感，認爲人物孤獨來說總是軟弱無力，認爲他們不同羣衆結合便不能有何實際作爲」——譯者）。

顯著的影響，這些特性又不單只是取決於國民發展底一般規律，而永遠並且大半是在可以叫作私人生活偶然現象的影響下形成。我們且舉幾個例子來把這個顯然無須說明的思想說明一下。

在奧皇繼嗣戰爭時期，法國軍隊獲得過幾次輝煌的勝利，所以法國當時顯然能從奧國方面索得現今比國境內很大一部分領土的讓步；但路易十五却並沒有索取過這種讓步，因為他——據他自己說——並非以一個商人資格，而是以一個國王資格進行戰爭的，所以亞琛和約也就使法國一無所得；但假如路易十五具有另外一種性格，那末法國領土也許會擴大起來，而它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進程也就會稍有不同了。

大家知道，七年戰爭，法國却已是同奧國結成聯盟來進行的了。據說，在締結這次聯盟的事情上，保拜都爾夫人（註一六）出力甚大，這是因為她深以驕傲的馬利亞在寫給她的那封信裏稱她做表妹或親愛的女友（*bien becme amie*）為幸。因此我們可以說，若是路易十五底性情嚴峻一點，或是說，如果他們沒有那樣厲害地屈服於他那些寵妃底影響，那末保拜都爾夫人也就會不能對事變進程起這樣重大的作用，而事變底局勢也就會是另外一種樣子了。

其次，七年戰爭結果是於法國不利的：法軍將領遭到過幾次可恥已極的失敗。而且他們的舉動根本就是奇怪已極：黎塞留專幹擄掠勾當，蘇俾茲和布洛利兩人始終是互相掣肘。例如，當布洛利在費里高一帶對敵人實行攻擊時，蘇俾茲雖聽見了砲聲，但他却沒有依照預先約定並且顯然是他所應該作的那樣去援助這位同胞，結果竟使布洛利不

得不實行退却\*。而當時袒護極庸碌將官蘇俾茲的仍是那位保拜都爾夫人。所以我們又可以說：假如路易十五不是如此好色成性，或是說，假如他這位寵妃沒有干預政事，那末事變結果也許不會這樣不利於法國的。

據法國史學家說，當時法國根本不應該在歐洲大陸作戰，而是應該集中全力到海上去反對英國侵略法國殖民地領土的行動。法國之所以沒有這樣去作，又是由於保拜都爾夫人底過失，因為她始終都想在她那位「親愛的女友」馬利亞面前討好。由於七年戰爭的結果，法國喪失了最好的殖民地領土，結果無疑是對法國經濟關係發展進程有過重大的影響。在這裏，女人的虛榮心理竟成了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強大「因素」。

還要舉出其他什麼例子來說明一下麼？那末就讓我們再舉出一個也許是最鮮明不過的例子來說說吧。同是在這個七年戰爭時期，一七六一年八月間，奧軍在西里細亞同俄軍匯合之後，已把當時駐紮在施特里高一帶的腓特烈軍隊包圍起來了。腓特烈處境危急萬分，但聯軍却一再遷延攻擊，而俄將布圖林（註一七）在敵軍面前停駐二十日之後，甚至完全退出了西里細亞，只留下一部分軍隊去支援奧將牢敦。牢敦佔領了距腓特烈軍隊據守地點很近的什維尼茨城，但這次勝利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若是布圖林為人堅決一點，那結果又會怎樣呢？若是聯軍向腓特烈舉行了攻擊，使其無法築壘固守，那結

\*有些人却說當時錯的不是蘇俾茲而是布洛利，因為布洛利不願同蘇俾茲分沾功名，所以沒有等候他來援助。但這對於本題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這不能把情形改變絲毫。

果又會怎樣呢？也許聯軍會把腓特烈完全擊破，使其不得不接受勝利者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哩。可是經過幾月後又發生了一次偶然事件，即俄女皇依利薩伯病歿，結果竟使局勢一下子就變得大大有利於腓特烈了。試問：假如布圖林爲人較爲堅決一點，或者說，假如當時擔任指揮職務的不是他而是如蘇渥洛夫（註一八）那樣的一個人，那結果又會怎樣呢？

聖畢夫批判「宿命派」史學家底觀點時，又還說出過我們所應注意的另一種意見。他在我們已經摘引過的那篇論米厄尼法國革命史的文章中，認爲決定了法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的不僅有這次革命所由以發生的一般原因，也不僅有這次革命反過來所激起的種種情欲，並且還有常被一般研究家忽略過去，甚至完全不能真正叫作社會現象的許多細小現象。他寫道：「當這些（一般）原因和（由它們所引起的）種種情欲發生作用的時候，自然界的物理和生理因素也不是無所作爲的；石頭仍然受着地心吸引力的支配；血脈也沒有停止循環。假若米拉波未因偶患寒熱病症死去，假若羅伯斯庇爾忽被偶然墜落下來的一塊磚瓦擊死或因患腦沖血病死了，假若拿破崙中彈殞命了，那末事變進程難道不會有所變更麼；難道你們敢於斷定說事變結局也會是那樣的麼？當我所假定的那種偶然事件充分具備時，事變進程就會與你們所認爲不可避免的這種進程完全相反。而我這樣假定是有理由的，因爲革命底一般原因及其所引起的那種情欲並不能排斥這種偶然現象。」接着，他又援引人所共知的意見，說要是克列奧帕特爾皇后底鼻梁生得矮一點，歷史進程也許會成爲完全另一種樣子；最後，他認爲雖然可以說出許多理由來辯護米厄尼

厄底觀點，但他又指出了米尼厄錯誤的地方。他說：米尼厄把一切結果都歸因於一般原因的作用，殊不知這些結果同時也是由其他許多細小曖昧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成的；米尼厄底嚴格頭腦，好像根本不願承認他所認為沒含有一定次序和規律的那些現象存在。

## (六)

聖畢夫提出這種異議，是不是有什麼理由呢？看起來彷彿是有某些理由。究竟有多少理由呢？爲了確定這一部分理由，我們首先就要把認爲人能「用自己意志突然底決定」來給事變進程添進一種新力量而使其大大改變的這種意見考察一下。我們已經舉出了我們認爲極能說明這種意見的一些例子。現在我們就要把這些例子仔細思索一下。

大家知道，當路易十五在位時代，法國軍事力量愈益衰落下去。據馬爾騰所說，在七年戰爭時期，法國軍隊始終都有許多妓女、商人和僕役跟着，軍中輜重馬匹要比騎行馬匹多兩三倍，所以這個軍隊與其說是秋連和古斯達福·奧多爾夫那樣的軍隊，不如說是達里和薛西斯那樣的匪羣\*。阿恆合爾茨在記載這次戰爭經過的著作中指出說：當時法軍中被指定放哨的官長，往往隨便離開哨所跑到鄰近地方去跳舞，只有他們認爲必要和方便的時候，才肯執行上司命令。法國軍中情形這樣惡劣，是由於貴族階層衰敗，——但當時這個階層仍然把持着軍中一切高級職位，——以及當時全部「舊秩序」因普

\* "Histoire de France", 4me édition, t. XV, p. 520-521.

遍解體而迅速陷於破壞的緣故。單只這些一般原因，已經完全足夠使法國在七年戰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了。但是，蘇俾茲一類將領庸碌無能的事實顯然又使法軍由一般原因決定的那種失利危險增加增起來。既然蘇俾茲底地位是全靠保拜都爾夫人來支持，於是我們就必須承認，這位貪求虛榮的夫人乃是在七年戰爭時期大大加深了一般原因對法國不利影響的一個「因素」。

保拜都爾夫人之所以強而有力，並非由於她自己有什麼力量，而是因為大權在握的國王聽從她的意旨。能不能說路易十五底性格按照法國當時社會關係發展進程定應如此呢？決不能這樣說。在當時那樣的發展進程中，也可能有一個用別種態度對待女人的國王出現。聖畢夫也許會說，這裏只要有一種不可捉摸的曖昧生理原因底作用就行了。如果他真這樣說，那他就會說得正確。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這種曖昧的生理原因既影響到七年戰爭底進程和結局，也就影響到了法國後來的發展情形，因為法國如果在七年戰爭中沒有失去一大部分殖民地領土，它的發展情形也許會是另一種樣子哩。試問這個結論是否與社會發展規律性的概念相抵觸呢？

不，絲毫也不相抵觸。個人的特性在上述場合發生過作用是沒有疑問的；但這種作用只有在當時那種社會條件下才能發生，也同樣是沒有疑問的。自法軍在羅斯巴哈遭到失敗以後，法國人民對於庇護蘇俾茲的這位女人極表憤慨。她每天都收到許多充滿威脅



冒罵的匿名書信。因此保拜都爾夫人深爲焦慮，寢不安席\*。雖然如此，但她還是極力袒護蘇俾茲。一七六二年，她在致蘇俾茲的信中一面責備他有負厚望，接着便補充說：「但你不必畏懼，我會設法來保護你，消除國王對你的誤會。」\*\*可見，她並沒有對法國社會輿論讓步。爲什麼她沒有讓步呢？大概是因爲當時法國社會沒有可能強迫她去讓步。爲什麼當時法國社會不能做到這點呢？原來是因爲當時法國社會本身結構惡劣，而這種惡劣的社會結構又是由當時法國社會力量對比關係決定的。由此可見，社會力量的對比關係，也就是路易十五底性格及其寵妃底癖性竟能對法國命運發生出這樣一種悲慘影響的根本原因。如果具有這種寵愛女人的癖性的不是國王本人，而是王室中某一個廚司或馬夫，那這種癖性就不會發生什麼歷史作用。可見，問題並不在於這種癖性，而是在於具有這種癖性的人所佔的社會地位。讀者當然懂得，這種論斷對於上述其他一切例子也都是適用的。只是要在運用這種論斷的時候把應當改換的對象改換一下就行了，例如把法國換成俄國，把蘇俾茲換作布圖林等等。因此，我們也就不去重複這些論斷。

由此可見，個人因其性格帶有某種特點而能影響到社會底命運。這種影響有時甚至是很大的，但這種影響表現的可能及其範圍，却要依當時的社會結構，以及當時的社會力量對比關係來決定。個人底性格只有在社會關係所容許的那個時候、地方和程度

\*參見 “Mémoires de madame du Hausset”, Paris 1824, P. 181.

\*\* “Lettres de la marquise de Pompadour”, Londres 1772, t. I. o

內，才能成爲社會發展底「因素」。

也許有人會說，個人影響底範圍是與個人才能也有關係的。是的，我們同意這種意見。但個人祇有在社會上佔有相當的地位時，才能表現出自己的才能。爲什麼法國命運竟能操在一個既沒有什麼能力，也沒有什麼熱心去替社會服務的人物手中呢？這是因爲法國當時的社會結構會是如此。正是這種社會結構，才使某些賢明人物或庸碌分子在某時候能表現一定的作用，因而也就能表現出一定的社會影響。

個人底作用既然是由社會底結構來決定，那末試問他由這種作用所制約的社會影響，又怎麼會與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概念相抵觸呢？個人底社會影響不僅不與這種概念相抵觸，並且是對於這種概念的一種最鮮明的證實。

不過這裏必須說明一點。既然個人有可能表現出受社會結構制約的社會影響，於是那些所謂偶然現象就能影響各國人民底歷史命運。路易十五好色成性，原是他那種體質底必然結果。但這種體質對於法國一般發展進程却是一種偶然的現象。但我們已經說過，這種體質對於法國後來的命運不是沒有發生影響，而是成了決定這個命運的一種原因。米拉波之死，當然是由於完全合乎規律的那些病理作用的結果。但這種病理作用的必然性，並非由法國一般發展進程所引起，而是由這位著名演說家個人體質上某些特點以及他染受疫症時所處的那些物理條件所致然。這些特點和這些物理條件，對法國一般發展進程來說是種偶然的現象。可是米拉波之死却影響到了法國革命後來發展的進程，成了決定這個進程的諸原因中的一種原因。

在上述那個說明腓特烈第二只是因為布圖林優柔寡斷才得逃出窘境的例證中，偶然原因底作用表現得更為明顯。布圖林被任為俄軍總司令一事，甚至對於俄國一般發展進程也可說是我們所認定的那種偶然性的現象，而對於普魯士一般發展進程說來，當然是毫不相干的。但實際上我們却很可斷言，只是由於布圖林優柔寡斷，才使腓特烈逃出了絕望的境地。如果當時被任為俄軍總司令的不是布圖林而是蘇渥洛夫，那末普魯士底歷史進程，也許會成為另外一種樣子的。可見，國家底命運有時候還會由一些可說是次等偶然現象的偶然現象來決定哩。黑格爾嘗說：“In allem Endlichen ist ein Element des Zufälligen”（一切終結現象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我們在科學中所考察的只是『終結現象』；因此可以說科學所研究的一切過程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這是否會使對於各種現象的科學認識成為不可能呢？絕對不會。偶然性是一種相對的東西。它只會是在諸必然過程交叉點上出現。歐洲人在美洲出現，對於墨西哥和秘魯土人說來是種偶然的現象，因為這種現象並不是從這幾個美洲國家底社會發展過程中發生的結果。但西歐人在中世紀末期傾心於航海事業却不是偶然的；歐洲人底力量很快就打破了土人反抗，也不是偶然的。同樣，歐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魯而引起的影響，也不是偶然的；這種影響歸根到底是由兩種勢力底合成力所決定：一種勢力是各被征服國家底經濟狀況；另一種勢力便是各征服國家底經濟狀況。這兩種勢力及其合成力，是完全可以用嚴格科學眼光來考察的。

七年戰爭中的偶然現象，對於普魯士後來的發展史有重大的影響。可是，如果當時

普魯士處於另一種發展階段，那末這些現象所發生的影響就會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偶然現象底影響在這裏也是由兩種勢力底合成力所決定：一方面是當時普魯士底社會政治狀況，另一方面是當時影響了普魯士的那些歐洲國家底社會政治狀況。可見，這裏的偶然性也絲毫不妨礙對於各個現象的科學研究哩。

由此可知，個人往往能對社會命運發生重大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是由該社會底內部結構及其對於其他諸社會的關係所決定的。但這還不能概括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我們還應從另一方面來考察一下。

聖畢夫以爲他所指的那種細小曖昧的原因完全具備時，法國革命就會有與我們所知道的結局相反的結局了。這是個嚴重的錯誤。不管心理上生理上的細小原因錯綜結合得怎樣奇巧，但它們絕對不能消除法國革命所由引起的種種巨大社會需要；當這些需要尚未得到滿足時，法國的革命運動是不會停止的。爲了使法國革命運動能有一種與當時實在結局相反的結局，就必須用相反的需要來代替這種需要；但這當然是任何一種細小原因的湊合也辦不到的。

法國革命底原因是在於當時那種社會關係底特性，聖畢夫所假定的那些細小原因却只能根源於單個人物底個人特點。社會關係底根本原因是在於生產力底狀況。生產力底狀況所取決於單個人物個人特點的地方，至多也不過是這種人物對於從事技術改良、技術發現和發明的能力的大小。聖畢夫所指的並不是這種特點。可是其他一切特點都不會使單個人物能直接影響到生產力狀況，因而也就不能直接影響到生產力狀況所決定的

社會關係，即經濟關係。當經濟關係適合於當時生產力狀況的時候，那末一個人物無論有怎樣的特點，也不能把這種經濟關係消除的。但是一個人物究竟在什麼程度上能夠從事於滿足當時經濟關係所引起的社會需要或阻礙這種滿足，却要由這個人物底個人特點來決定。十八世紀末期法國最迫切的社會需要，是要推翻陳腐政治制度，而代之以適合於法國新經濟制度的另一種政治制度。當時最有名望和最有益處的社會活動家，正是那些最能幫助滿足這種最迫切需要的人物。我們假定說米拉波，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就是這樣的人物。如果米拉波未因早死退出政治舞台，那末情形又當怎樣呢？那末，君主立憲黨就會把自己所有的巨大政治力量保持得較為長久，於是它對於共和派的抵抗也就會更為堅強。但也不過如此而已。無論怎樣一個米拉波，都不能防止當時共和派底勝利。米拉波底力量全靠民衆同情和信任來支持，而民衆是趨向於共和制度的，因為當時朝廷那種頑強保護舊制度的政策激怒了民衆。所以民衆一知道米拉波不同情於他們的共和趨向時，就會不復對他表示同情，於是這位大演說家底影響就會喪失殆盡，結果他就會由他自己徒然力圖阻止的那個運動所推翻。羅伯斯庇爾底情形大致也是如此。我們假定說他在他的黨內是個完全無可替代的大人物。但他畢竟不是這個黨內唯一的大人物。假如他在一七九三年一月間（註一九）偶然被墮落下來的一塊磚瓦打死了，那末當時一定會有另外一個人物來替代他，這個人物也許在各方面都比不上他，但事變進程畢竟還是會按其在羅伯斯庇爾在世時所走的那種方向發展下去的。譬如說，基耶特黨人在這種場合也會不免要遭受失敗；不過，羅伯斯庇爾黨喪失政權也許來得更早一些，因而我們

現在就會不是說熱月的反動（註一〇），而是說花月，草月或穉月的反動（註一一）。也許有人會說，羅伯斯庇爾所採取的殘忍恐怖手段，只是加速而不是延緩了他那個黨覆亡的時日。我們且不去考察這種假設，而把它當作一個完全有根據的假設吧。這樣一來，就會必須假定羅伯斯庇爾黨底覆亡不是發生於熱月，而是發生於果月，葡月或霧月。總而言之，這個事件也許發生得早一點，或是發生得遲一點，但它終究是一定要發生的，因為這個黨所憑藉的那個人民階層沒有實行長久統治的能力。然而，無論如何也不會有與羅伯斯庇爾所努力促成了的那種結果「相反的」結果發生。

我們就假定拿破崙在阿爾科會戰時中殫殞命了，但也不會有這種「相反的」結果發生的。拿破崙在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征伐中所作出的事情，是會由其他的將領作出的。這些將領也許沒有拿破崙那樣的才能，也許不能獲得那樣輝煌的勝利。但法蘭西共和國畢竟還是會在當時各次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因為法國兵士比當時歐洲其他各國兵士都要優良得不可比擬。至於霧月十八日政變（註一二）及其對於法國內部情形的影響，那末事變底進程和結局實際上，也想必會與由拿破崙當權時的情形相同。因熱月九日反動政變而受到致命重傷的共和制度，已經是奄奄待斃了。督政部根本不能恢復當時擺脫了上層等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所渴望的秩序。當時為要恢復秩序，就需要有如西依史所說的那樣一枝「寶劍」。起初大家以為這種寶劍使命可以由朱伯爾將軍來執行，但當他在納威

會戰時陣亡以後，大家便提到莫洛，麥唐納和被納多特等人了\*。拿破崙這個名字，還是後來才被提起的。如果他也如朱伯爾那樣陣亡了，那末大家就根本不會談到他，而會提出另一枝『寶劍』來。自然，一個被事變抬上了獨裁者地位的人物，應該自強不息地鑽營政柄，堅毅果決地的一切阻礙他前進的人推開並予以無情打擊。拿破崙具有鐵一般的毅力，他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沒有留過什麼情面的。但當時除他而外，也還有過不少堅強能幹，貪圖功名利祿的人物。他所掙得了的那個位置大概是會空閒起來的。假定另一位將軍爭得這個位置後，舉動比較拿破崙溫和一點，不會激起全歐洲的反抗，結果這位將軍就會是死在推勒里宮中（註二），而不是死在聖葉倫島上。那末，布爾奔皇族就會根本無法回到法國來，這樣的結果，對於他們說來，當然是與實際上所發生的那種結果『相反』，但對於法國整個內部生活說來，却是與實際的結果很少區別的。當這枝『寶劍』恢復了秩序，保證了資產階級獲得統治以後，資產階級很快就會厭惡這枝『寶劍』所表現的那種軍營習慣和專擅行爲。於是就會有在復辟時代發生過的那種自由主義運動發生起來，鬥爭就會漸漸熾烈起來。既然那些『寶劍』不很愛作讓步，那末仁慈的路易腓力普代替他所懇懇愛慕的同宗來登王位也許不是在一八三〇年，而是在一八二〇年或一八二五年。事變進程中的這一切變化，也許能局部影響到歐洲後來的政

\* 參看 *La vie en Franc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par le vicomte de Broc, Paris 1895, pp. 35-36* 及往下各頁。

治生活，並經過這政治生活而影響到歐洲經濟生活。但革命運動底最後結局終究是不會與實在的結局「相反」的。大人物憑靠他們那種頭腦和性格上的特點，雖然也能使各個事變底單個外貌以及各個事變底某些局部後果改變一個樣子，但這些特點終究不能改變事變底一般方向，因為這種方向是由別種因素決定的。

(七)

除此而外，還要注意到如下一點。一般人講到偉大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時，差不多總是發生一種錯誤觀念。向讀者指出這種錯誤觀念，大概是不會沒有益處的吧。

拿破崙既担起了挽回社會秩序的「寶劍」使命，於是就排除了其餘一切將官担負這種使命的機會，雖然這些將官中間也許有些人是能像他那樣或差不多像他那樣執行這種使命的。當社會要有一個堅毅軍事統治者的這種需要已獲得滿足時，社會的結構就堵截了其餘一切能幹軍人或成爲軍事統治者的途徑。於是這種結構底力量就成了障礙其他能幹軍人表現其才能的力量。由此就有我們現在所說的那種錯誤觀念發生。因此一般人就未免極端誇大了拿破崙個人的力量，因爲他們竟把提出和支持了這種力量的全部社會力量通統歸到他一人份下去了。由是大家就覺得拿破崙個人的力量是個唯一無二的力量，因爲所有其餘與他相同的一切力量都沒有由可能變成爲現實。當人們聽說假如沒有拿破崙，那末情形就會不知怎樣的時候，於是人們的想像就混亂起來，竟以爲如果沒有拿破崙，就根本不會發生拿破崙個人力量和影響所憑藉的那種社會運動。



在人類智慧發展史中，因某一個人物獲得成功而使另一個人物不能獲得成功的情形，是要稀少得無比。但是人們在這方面也不能完全避免上述那種錯誤觀念。當一定的社會局勢在其精神代表人物面前提出相當任務的時候，那末這些任務在英俊人物尚未把它們解決以前是始終引起英俊人物注意的。而當他們已能解決這種任務時，他們的視線就會轉注到另一種對象上去。當一個英俊人物A已把任務X解決時，於是英俊人物B就會離開這個已經解決的任務而去注意另一個任務，即注意任務Y。當你問到如果A還沒把任務X完成而就不幸死去，那末結果又會怎樣的時候，人們就會發生一種錯覺，以為社會智慧發展的綫索將因此中斷。殊不知A死去之後，這個任務是會由B或C與D去担任解決的，所以雖然A不幸早死了，但社會智慧發展的綫索依然是會完整無缺的。

爲了使一個擁有某種才能的人能運用他的這種才能來對事變進程發生重大影響，就需要有兩個條件。第一，他所具備的才能應比別人所具備的才能更適合當時社會的需要；如果拿破崙所具備的不是他那種軍事才能，而是彼多芬那樣的音樂才能，那他當然就會做不到皇帝。第二，當時社會制度不應阻礙具備有恰合當時需要並於當時有益的特性的那個人物施展其能力。如果法國舊制度再延續過七十五年之久，拿破崙也許終身也不過是個不大著名的包納泊特將軍或上校\*。在一七八九年間，達武、達黎、馬爾蒙和

\*那時，拿破崙也許會像他在法國革命幾年以前所打算的那樣到俄國軍隊中去服務。如果他果真去了，他或許能在俄軍反對土耳其軍隊的戰鬥或反對高加索山民的戰鬥中顯一顯身手，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個地位微賤而頗有才能的軍官，在情況順利的時候能够成爲世界霸主的。

麥唐納還不過是少尉；伯納多特還只是個上士；何西、馬索、勒非甫耳、皮士格律、內依、馬森、繆拉、蘇爾特還是些軍曹；歐什洛還是個劍術教師；蘭恩還是個染匠；孫錫爾還是個戲子；茹爾丹還是個小販，別西爾還是個剃頭匠；布隆還是個排字匠；朱伯爾和朱諾還是法科學生，克雷貝爾還是個建築家；摩爾退直到革命發生時還沒在軍中服務\*。

若是舊制度至今仍然存在，那末現在誰也不會想到前世紀末期法國曾有過一些戲子、排字匠、剃頭匠、染匠、律師、小販和劍術教師，原來是些處於可能狀態的軍事幹才哩\*\*。

斯騰達爾說，一個與梯齊阿諾同年，即一四七七年誕生的人，可以與拉斐爾（死於一五二〇年）以及達芬奇（死於一五一九年）同時度四十年的生活，他可以與一五三四年逝世的科列志以及一五六三年死去的米開蘭基羅同時生活很長一個時期，他當佐佐涅去世時還不過三十四歲，他能親眼看見廷托勒特、巴撒諾、味洛里則、羅曼諾和薩托等

\*見 *Histoire de France*, par V. Duruy, Paris 1893, t. II, pp. 52+525.

\*\*當路易十五在位時代，第三等級中只有塞維爾一人才升擢到了中將銜。當路易十六在位時代，第三等級中人在軍中陞進的途徑更感困難了。見 *Rambaud,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sixième édition*, t. II, p. 226.

人；一句話說，他能做一切偉大畫家底同代人，不過看不見一百年後才出現的波倫亞學派中的人物\*。同樣也可以說，一個與奧味曼同年誕生的人幾乎能親身同荷蘭所有一切偉大畫家相識\*\*，而莎士比亞底同庚則可以和整整一羣卓絕戲劇作家同時生長\*\*\*。

早已就有人說過，凡是有便於英俊人物發揮其才能的社會條件的時候和地方，總會有英俊人物出現的。這就是說，每一個真正顯出了本領的英俊人物，即每一個成了社會力量的英俊人物，都是社會關係底產物。但由此就可看出，英俊人物，正如我們所說過

\* *Histoir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 Paris 1892, pp. 24-25.

\*\* 一六〇八年間誕生的有特爾保，布牢厄，林布蘭；一六一〇年間誕生的有凡奧斯特，波特，波爾；一六一三年間誕生的有凡得赫爾斯特，施拉爾道；一六二〇年間誕生的有奧味曼；一六二一年間誕生的有維尼克斯，厄味定根和拜納克爾；一六二四年間誕生的有伯爾格姆；一六二五年間誕生的有坡特爾；一六二六年間誕生的有楊斯騰；約於一六三〇年間誕生的有麥楚；一六三〇年間誕生的有留斯達爾；一六三七年間誕生的有凡得亥登；一六三八年間誕生的有和怕馬；一六三九年間誕生的有凡得維爾。

\*\*\* 同時出現或相繼出現的莎士比亞、彼蒙得、弗列特契爾、約翰孫、韋伯斯特、馬幸澤、福耳德、彌得爾敦和黑武德等人便是一輩新起的人物，他們憑靠他們所處的那種方便的境遇而在前一輩人物所已預備好的土壤上繁盛滋長了起來。】（見太納所著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1865, t. I, p. 468）

的，只能改變當時事變底個別外貌，却不能改變當時事變底一般趨勢；他們自己是完全順應着這種趨勢出現的；沒有這種趨勢，他們是永遠也跨不過由可能進到現實的門階的。

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英俊人物。太納說得對：「當文明發展進程中新的進步產生出一種新的藝術時，總會有幾十個以一兩個天才人物為中心的英俊人物應運而生，幾十個英俊人物只能把社會思想表現出一半，而一兩個中心天才人物却能把這種思想完全表現出來」\*。若是拉斐爾、米開蘭基羅和達芬奇在童年時期就被一些與意大利社會政治和精神發展進程沒有關係的機械原因或生理原因擊死了，意大利的藝術也許不會發展得那樣完備，但它在文藝復興時期發展的一般趨勢終究會同是那樣的。拉斐爾、米開蘭基羅

和達芬奇並沒有創造出這種趨勢，他們自己不過是這種趨勢底優秀代表人物。固然，在一個學才人物周圍通常有整個學派出現，並且他那些門徒總是努力把他的方法，甚至極細微的方法也都拿來運用，因此，拉斐爾、米開蘭基羅和達芬奇如果不幸早年去世，那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藝術由此所遭到的損失便會對其後來發展史中許多次要特點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只要當時意大利精神文明發展的一般進程中沒有某種一般原因引起某種大變更，那末這種藝術發展史實際上也是不會有什麼變更的。

不過，大家知道，數的區別歸根到底是會轉變為質的區別的。既然到處都是如此，歷史上的情形當然也不能成為例外。某一藝術潮流中如果有好幾個能夠成為它的代表者

\* 見太納所著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Paris 1865, t. II, p. 5.

的英俊人物都因時運不齊而相繼夭亡了，那末這一潮流也許始終不會有什麼出色的地方。但這種人物底夭亡是只有在此潮流不很深刻，以致不能提出一些新的英俊人物的場合，才會使其不能有相當的表現。可是，文藝中任何一個潮流底深度都要依它對於自身所代表其趣味的那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底意義，以及這個階級或階層底社會作用如何來決定，所以這裏的情形歸根到底也是要依社會發展進程和社會力量對比關係爲轉移的。

(八)

總之，領導人物底個人特點能決定各個歷史事變底局部外貌，所以我們所說的那種偶然成分在這種事變進程中始終表現着相當的作用，但這種進程底趨勢歸根到底要由所謂普遍原因來決定，即實際上是由生產力底發展以及依此種發展爲轉移的社會經濟生產過程中的人們相互關係來決定。偶然現象以及著名人物個人的特點，其表現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顯著得無比。十八世紀的人們很少想到這些一般原因，却把歷史歸因於歷史人物底自覺舉動和情欲。當時哲學家認爲歷史發展進程可以因受某些極細微原因影響而完全變更其方向，譬如說，由於某個統治人物腦子裏有某個「原子」作怪（這是自然體系一書裏屢次表示過的一種意見）（註二四）。

歷史學中新思潮的擁護者認爲無論有怎樣的「原子」，歷史始終是只會循着它實際經過的那條路線進展的。他們因極求強調一般原因底意義，竟把歷史人物個人特點底意義完全忽略過去了。照他們那樣說來，歷史事變彷彿絲毫也不會因能力大小不一人物的

交替而有所變更\*。我們既認爲可以這樣假定，於是也就不免認定個人成分在歷史上根本沒有什麼作用，歷史上所有一切都歸因於一般原因底作用，都歸因於歷史發展一般規律底作用。這是走極端，是根本排斥相反觀點中所包含的那一部分真理。唯其如此，所以相反的觀點也就仍然保留有某種存在的根據。這兩種觀點間的衝突，表現成爲兩個相反命題互相對立的局面：一個命題是一般規律，另一命題是個人底活動。從後一命題方面來看，歷史不過是種種偶然現象底湊合；從前一命題方面來看，却會覺得甚至各個歷史事變底局部特點都是由一般法則底作用來決定。如果你認爲各個事變底局部特點都是由一般法則底作用所制約而與歷史人物底個別特性無關，那就不免要得出結論，說這種特點是由一般原因來決定，並且絲毫不會因歷史人物改變而有所改變。於是這個理論就變成爲宿命論。

反對這個理論的人們當然沒有放過它的這種弱點。聖畢夫把米尼厄底歷史觀點比作波綏（註二五）底歷史觀點。波綏認爲決定歷史事變的力量是從上帝那裏來的，歷史事變是專供上帝表現其意旨的東西。米尼厄認爲這種力量就是人類的情欲，這種情欲在歷史事變中間是像自然界的力量那樣不可遏止一往直前地表現出來的。但他們雙方都把歷史

\*即是說，像他們那樣推論歷史事變規律性，就會要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來。而他們中間有些人在簡單記述這種現象的時候，却甚至往往過分估計了個性底作用。但我們現在感覺興趣的不是他們所作的記述，而是他們所作的推論。

看作是一些絕對必然如此發生的現象所構成的一串連環；他們兩人都是宿命論者；在這一點上，哲學家實在是與牧師相近 (le philosophe se rapproche du prêtre)。

當社會現象規律性的學說還根本否認歷史上傑出人物底個別特點能對事變發生什麼影響時，這種責難本來是有相當理由的。而且這種責難本來應當引起很大的印象，因為新的歷史學派中的那些人也如十八世紀的史學家和哲學家一樣，認為人類天性是最高主體，所有歷史運動底一般原因都從這個主體中間發生，並且是服從於這個主體的。既然法國革命已經表明歷史事變不只是由人底自覺行為來決定，於是米尼厄、基佐以及屬於該派的其他學者就把往往不意識所支配的情欲衝動提到了首位。既然說情欲是歷史事變底最後最一般的原因，那末聖畢夫爲什麼又不能認定，說如果當時有一種人物能在法國人民中間激起一種與法國人民當時的情欲相反的情欲，則法國革命就會有其與實在結局相反的結局呢？米尼厄也許會要說：因為由於人類天性的關係，當時沒有其他情欲能激動法國人民。這種說法含有一部分真理。但這一部分真理帶有很鮮明的宿命論色彩，因為它無異是說人類歷史所有一切詳細情節都是由人類天性底一般屬性預決的。在此場合，宿命論就會是專門注重一般而抹煞個體的結果，並且始終都是這樣抹煞的結果。有人說道：「既然一切社會現象都是必然的，那末人們的活動都根本不能有什麼作用了。」這是對於正確意思的一種不正確的表述。本來應該說：如果說一切都是「一般原因」所造成的結果，那末個別的成分——包括我的努力在內——就根本沒有什麼作用。這樣的結論本來正確，只是一班人把它運用得不正確罷了。用這種結論來評判現代唯物主義歷

史觀是極不合理的，因為這個歷史觀對於個體作用也是予以承認的。但用這種結論去評判復辟時代法國史學家底觀點却是有根據的。

現在已經不能把人類天性當作歷史運動底終極的和最一般的原因看待了：如果說人類天性恆久不變，那它就不能解釋變化無窮的歷史進程；如果說它常有變化，那它的這種變化本身又是由歷史運動來決定的。現在應該把生產力發展情形看作人類歷史運動底終極和最一般的原因，人類社會關係方面的歷次變遷是由這種生產力決定的。除這種一般原因外，發生作用的還有一些特殊原因，即某個民族生產力發展進程所處的歷史環境，但這種歷史環境本身歸根到底又是由其他民族共同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即是由一般原因造成的。

末了，除特殊原因底影響而外，還有個別原因底作用，即社會活動家個人特點及其他「偶然性」底作用，因為有這些個別原因底作用，於是事變就具有其個別的外貌。個別的原因不能根本改變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底作用，而且個別原因影響底範圍和方向是由這種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所制約的。雖然如此，但如果影響了歷史的那些個別原因已被別種個別原因所替代，那末這個歷史無疑是會具有別一種外貌的。

莫諾和蘭普勒赫特兩人至今還是以人類天性為立腳點。蘭普勒赫特硬說，並且再三再四聲言，說他認為社會心理是歷史現象底根本原因。這是個嚴重的錯誤，正因為有這樣一個錯誤，所以力求概括「全部社會生活總合」的那種本來值得嘉獎的志願，也就只能得出一種外表雖然美觀，但內容却完全空虛的折衷主義結論，或是得出——在那些推



論得最澈底的人們那裏——像卡布里茨那樣一種妄談理性和感覺孰重孰輕的議論。

但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吧。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因為他的個人特點使各個偉大歷史事變具有其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為他自己所具備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於當時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響下所發生的偉大社會需要。卡爾來（註二六）在其論英雄人物的名著中，把偉人稱呼為發起人（*Beginners*）。這個名稱用得極其中肯。偉人確實是發起人，因為他的見識要比別人的遠些，他的願望要比別人的強烈些。他把先前的社會理性發展進程所提出的緊急科學任務拿來加以解決；他把先前的社會關係發展過程所引起的新的社會需要指明出來；他擔負起滿足這種需要的發起責任。他是個英雄。其所以是個英雄，並不是說他能阻止或改變客觀自然事變進程，而是說他的活動是這個必然和不自覺進程底自覺自由的表现。他的作用全在於此，他的力量全在於此。但這是種莫大的作用，是種極大的力量。

俾斯麥嘗說，吾人不能創造歷史，而應該等候它自行造成。但歷史究竟是由誰造成的呢？它是由社會人造成的，社會人是歷史底唯一「因素」。社會人自己造成自己的關係，即社會關係。但他在某一時期造成某種關係而不是造成別種關係，這當然不是沒有原因，而是由生產力發展狀況所制約的。沒有一個偉大人物能够強迫社會去接受已經不適合於這種生產力狀況的關係，或是接受還不適合於這種狀況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確實不能創造歷史，所以他在這種場合移動他的錶針當然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他既不能把時間加速，也不能使時間倒退。蘭普勒赫特說得完全正確：俾斯麥在他威勢最

高的時候也是不能把德國推轉到自然經濟時代去的。

社會關係有它自己的邏輯：當人們還處於某種相互關係時，他們的感覺、思維和行為也就一定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一個社會活動家要想反對這種邏輯，也會是徒勞無益的，因為自然的客觀事變行程（即這種社會關係邏輯）定會把他的一切努力化為烏有的。然而我如果知道社會關係因社會經濟生產過程中發生某種變化而朝着什麼方向變更，我也就會知道社會心理將朝着什麼方向變更，因此我就有可能影響這個心理了。影響社會心理，也就是影響歷史事變。可見，在相當意義上說，我畢竟能夠創造歷史，因此我也不必等候歷史去『自行造成』。

據莫諾底意見，歷史上真正重大事變和人物之所以重大，祇在於他們是社會機構和經濟條件發展底符號和象徵。這一意見頗為公允，不過表述得很不確切；但正因為這種意見公允，所以決不可把偉大人物底活動同這種條件和機構底『緩慢變動』對立起來。『經濟條件』較為緩慢的變更過程，到一定的時候就會使社會必然要較為迅速地改造自己的機構。這種改造從來不是『自行』發生，而是始終需要由人們來干預的，因此人們担负有偉大的社會任務。所謂偉大人物，也就是最能幫助解決這種任務的人物。解決任務，當然不能只算是任務解決的『象徵』和『符號』。

我們覺得，莫諾之所以竟把兩者對立起來，主要是因為他為『緩慢』這一愜意的字眼迷住了。這個字眼是很多現代進化論者所愛用的字眼。這種偏頗態度在心理上很容易解釋：它是必然要在那些崇尚溫和客氣的體面人們中間產生的。但它在邏輯上根本不

值一駁，黑格爾早已就指出這點了。

並且不僅那些「發起人」，不僅那些「偉大」人物擁有大顯身手的廣大活動場所。凡是願用眼睛來看，願用耳朵來聽，願拿一顆誠摯的心來愛護親近的人，都擁有這種場所。「偉大」一語是個相對的概念。在道義方面說，每一個如聖經上所說願意「舍己救人」的人都是偉大的。

## 簡 註

(註一) 卡布里茨 (一八四八—一八九三)，係俄國民粹派作家。

(註二) 所謂「可敬的社會學家」，是指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思想家尼·米海洛夫斯基而言。米海洛夫斯基讀到卡布里茨那篇文章後，馬上就在自己的一八七八年文藝隨筆中對它作過評判。

(註三) 郎松 (一八五七—一九三四)，係法國文學研究家兼文藝史學家。

(註四) 史達木萊爾 (一八五六年生)，係德國新康德派哲學家，否認歷史規律性。

(註五) 拜林斯基 (一八一—一八四八)，係俄國傑出的批評家兼政論家。

(註六) 琴梅爾 (一八五八—一九一八)，係德國唯心派的哲學家兼社會學家，崇尚康德思想。

(註七) 俄國主觀主義者是指拉福洛夫、米海洛夫斯基、卡列夫等人而言。

(註八) 俄國「門徒」係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即社會民主黨人在合法刊物上寫迷糊書報檢查局耳目而自稱的符號。

(註九) 阿卡吉·阿卡吉也維奇係戈果里所著中篇小說外套中的主人公，象徵着典型的小官僚。

(註一〇) 蘭普勒赫特 (一八五六—一九一五)，係德國資產階級史學家，著有德意志史多卷。  
(註一一) 基佐、米尼厄和梯葉里，係法國復辟時代 (一八一四至一八三〇年) 資產階級史學家。

(註一二) 韋科是十八世紀前半期意大利哲學家兼史學家；孟德斯鳩是同時期法國社會學家；赫得爾是十八世紀後半期德國哲學家兼史學家。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會企圖確定出歷史過程底規律性，認為歷史事變進程並不依帝王將相底意旨為轉移。據韋科底意見，這種規律性就在於歷代國家興亡交替都是循着上帝所決定的永恆輪迴次序發生的。孟德斯鳩和赫得爾企圖把歷史規律性歸因於自然條件，主要是歸因於氣候和地理環境對社會的影響。

(註一三) 馬布里僧正 (一七〇九—一七八五)，是法國的一個空想共產主義者，他認為帝王豪傑底活動是歷史變遷底基本原因。

(註一四) 梯也爾 (一七九七—一八七七)，係法國反動政治家、政論家兼史學家。殘酷鎮壓巴黎公社的事件就是由他組織的。

(註一五) 聖畢夫 (一八〇四—一八六九)，係法國詩人兼文藝批評家。他認為個人底活動與社會條件無關。

(註一六) 保拜都爾 (一七二一—一七六四)，是法王路易十五底寵妃，在當時法國對內對外政策上起過頗大的作用。

(註一七) 布圖林伯爵 (一六九四—一七六七)，是俄國大元帥，在七年戰爭中 (一七五六—一七六三) 担任過俄軍總指揮。

(註一八) 蘇渥洛夫 (一七三〇—一八〇〇)，係俄國傑出的統帥。

(註一九) 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是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六被斬之日。

(註二〇) 熱月的反動是在法國熱月九日 (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反革命政變後造成的政治

社會反動局面。熱月九日的政變推翻了小資產階級專政，並把小資產階級專政底領袖羅伯斯庇爾推到斷頭台上斬決了。

(註二一) 熱月，花月，草月，穉月，霧月等，是法國康文梯（國民公會）於一七九三年秋頒行的革命年曆月名。其所以如此稱呼，是要強調出革命勢力毅然決然與反革命天主教會破裂的事實。

(註二二) 共和國八年霧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是拿破崙（巴納帕特）舉行政變之日。這次政變結果推翻了督政部，成立了執政府，隨後又成立了帝國。

(註二三) 推勒里係巴黎城中法王故宮，後爲拿破崙第一宮室所在地。

(註二四) 自然體系是法國傑出唯物哲學家霍爾巴赫（一七二三—一七八九）底主要著作。

(註二五) 波綏主教（一六二七—一七〇四），係法國哲學家兼著作家。

(註二六) 卡爾來（一七九五—一八八一），係英國資產階級著作家兼史學家。

## 論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

尤 琴

關於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這一問題，在歷史科學上和社會學上永遠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在這個問題的周圍在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和社會學家之間過去和現在都進行着劇烈的論爭。

這個問題底如何解決總是在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理解上的、在歷史一般規律解釋上的基本的出發的立場根本地和直接地聯結着的。這是很明顯的，因為關於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一般學說底一個從屬的問題。

只有馬、恩、列、斯底歷史唯物論底理論給了唯一正確的、辯證唯物論的基礎來正確的解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大家知道，歷史科學底成爲真正的科學，只有在馬克思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應用其論點在歷史之上之後。大家知道，在馬克思以前，關於社會的科學，實質上說，還是不會有的。關於社會，關於人類歷史曾經寫了不少的著作，可是所有這些著作都還沒有提高到真正的和嚴格科學的觀察歷史發展的規律，列寧說：「唯物史觀底發明，或者正確些說，唯物論底徹底發揮和應用於社會現象底領域內消滅了過去的各种歷史理論底兩個主要缺點：第一，過去的各种歷史理論，至多只是考察

了人們歷史活動底觀念的動機，而沒有研究什麼東西喚起了這些動機，沒有找到在社會關係體系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沒有在物質生產發展底程度上看到這些關係底根源；第二，過去的各种歷史理論，恰恰沒有包括人民羣衆底行動，而歷史唯物論第一次使我們能够以自然——歷史底精確性來研究羣衆生活底社會條件和這些條件底變化。」\*

這是馬克思的對待社會的態度 and 馬克思以前的理論底基本區別之所在。這亦就是馬克思以前的社會理論底基本缺點。

馬克思以前的關於社會的學說，既沒有能够正確的理解社會發展底一般規律，亦沒有能够理解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因為他們不在社會本身內去找尋社會現象底基本原因，歷史事變底基本原因，而到各種或者與社會沒有直接關係的因素中，或者與社會雖有關係，而非基本的、直接的決定的因素中去找尋。

在資產階級科學中，對於人類社會的最流行的和統治的觀點，過去是，現在還是唯心論的觀點。

不論對於自然現象，不論對於社會現象，唯心論不在物質現實中，不在真實的、地上的、現實的、物質的人們底關係中看到這些現象的基礎，反而在彼岸世界中，觀念中，意識中，思維中看到它們。而在唯心論者所說的不是普通的人的觀念、意識和思維，在外間世界影響下產生於人的頭腦中的觀念、意識、思維。不！事物底本體，唯心

論者認為是特殊的觀念，特殊的意識，它不依存於物質，不由自然中產生，而相反，它存在於物質之先，自然之先並產生自然和物質。

從唯心論底觀點上看來，在人類社會中，觀念、意見、意識，是歷史事變底全部客觀進程，社會生活底一切現象底創造者。

唯心論者黑格爾認為觀念的發展（絕對觀念）是一切現象（不僅自然現象，而且人類社會現象）底基礎。黑格爾在人們意識底進步上看到社會現象底本質，而在這個人類意識底進步底基礎上，黑格爾放上絕對觀念、「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按黑格爾，人類社會底進步是「意識中的必然性的進步」，而必然性，即社會底動力是觀念、「世界理性」。

黑格爾底偉大功績就在他闡明了這個完全正確的論點，即歷史發展底過程是規律性的過程，而不是偶然性底亂堆，人物在歷史事變中不是任意地行動的，而是服從着歷史底一般的規律的進程。可是黑格爾在觀念上、在理性上、在「世界精神」上看到這個歷史事變底規律性底基礎。

可是黑格爾的「絕對觀念」或「世界精神」是什麼呢？列寧說：

「……任何人都知道，什麼是人的觀念，可是沒有人的和人以前的觀念、抽象中的觀念、絕對的觀念是唯心論者黑格爾底神學的臆說。」\*

\* 列寧全集卷一三，第一八六頁。



正如唯物論者費爾巴哈就已經正確地指出的一樣，黑格爾的「絕對觀念」是簡單的人的觀念、人的思想；不過似乎是從人的頭腦中抽了出來而變成了絕對，變成了物質現實底創造者。

黑格爾不能發現歷史事變規律性底真正的物質的基礎，他唯心論地對待歷史事變並將歷史歸結為意識底進步。按黑格爾，歷史歸結為人們底意見、觀念。因此，在他那裏歷史歸根結底變成爲歷史事實底偶然湊合，爲觀念和理想底不可解釋的運動，爲任意的、什麼也不依賴的、僅僅以自己的觀念爲指導的個人的活動。

從黑格爾的歷史理論中得出的這個結論，在他本人那裏並不怎樣明顯，因爲天才的黑格爾不管他的唯心論，在許多場合提高到傑出的分析歷史人物底行動底真正物質基礎。

這個結論在鮮明的形態中是由黑格爾的親近的學生——左派黑格爾派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信徒們做出來的。他們斷言：歷史就在於「自我意識」底進步。而「自我意識」（即觀念、意見）底產生者是生產觀念和意見的專門家（即批判地思想的人物），所以，他們亦就是歷史底創造者。

布魯諾·鮑威爾說，羣衆、愚衆、人民由於自己的無教育和保守只是阻礙着「批判地思想的人物」去完成歷史底進步。

布魯諾·鮑威爾是俄國民粹派社會學底直接的先驅者。後者，特別是拉芙洛夫直接抄襲布魯諾·鮑威爾關於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觀念。

我們已經說明了黑格爾的關於社會的唯心論的學說。在對待社會現象上的黑格爾底唯心論是從他的一般的哲學唯心論中產生出來的。

可是在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論者在對待社會現象上都是站在唯心論的立場上的。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者在解釋自然現象上是唯物論者。

十七——十八世紀底英國唯物論者（霍布士、洛克、都蘭特、孟德維爾、潑利斯脫里等），十八世紀底法國唯物論者（狄德羅、赫爾維齊、霍爾巴赫）在一般哲學學說上和自然哲學上曾進行了鬥爭反對唯心論和宗教。

他們證明了，自然不是任何人創造的，它永遠存在着，產生於自然界底現象底原因，不在自然界之外而在其內，人是自然底一部分，而人底思想是自然底產物。

一切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者在解釋自然上會有許多缺點，他們是機械論者，他們沒有理解沒有看到自然底辯證的發展。但是舊唯物論者在解釋自然上的基本論點是正確的。

十九世紀的偉大的德國唯物論者——費爾巴哈在以唯物論觀點解釋自然上是徹底的唯物論者。他否認了一切彼岸的、神明的、精神的力量。他證明了自然是一切生命底基礎，人是自然底一部分等等。

可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者只要一觸及歷史現象、人類社會時，他們便拋棄了唯物論底立場而成了唯心論者。在解釋社會現象上，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一般地（包括這

類偉大的思想家如法國唯物論者和費爾巴哈在內）是站在唯心論底觀點上的。

十七——十八世紀英國和法國的唯物論者對於國家、法律、不同的社會制度是如何產生的這一問題回答道，人們大家同意了和完全自覺地自願地訂立了『社會契約』。在這些唯物論者那裏，國家和社會不是客觀的社會發展底產物，不是首先是社會物質基礎發展底客觀規律底結果，而完全是人們自覺活動底產物，人的觀念意識底產物。

法國唯物論者對於怎樣解釋在社會上存在着好的或壞的秩序這一問題，回答道：就在人們有好的或壞的觀念，好的或壞的意見。他們按照這些意見確立社會秩序。社會秩序實質上是人的意識、意見底產物。『意見支配世界』——法國唯物論者曾經這樣說過。封建秩序會為法國唯物論者所厭惡。他們想消滅封建秩序。為着這點，他們以為改變人們底觀念、意見就夠了，在另一種精神下重新教育人們就夠了。

從這裏，關於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做出怎樣的結論來呢？法國唯物論者關於這個問題的結論如普列漢諾夫所說：

『意見支配世界——法國唯物論者曾說過：我們是意見底代表者，因此，我們是歷史底推動者；我們是英雄，愚衆只有追隨我們。』\*

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同時代人和伙夥——盧騷看到了當時的社會一方面是貴族底富裕和奢侈，另一方面是人民大眾底貧乏和窮困。盧騷問：『這種不公平從那裏來的呢？』

\* 普列漢諾夫全集卷七，第二四九頁。

回答道：

「那第一發生這樣的思想，即圈起一塊土地來並說『這是我的』的人（而有這樣純樸的人們竟相信了他），他便是市民社會底真正奠基者。如果有人聽了這話，拿起鋤頭平了溝濠並向其左右說，『最好不要相信這個騙子，如果你們忘了土地之果是屬於大家的，土地是不屬於任何人的，那麼你們就會滅亡』，這麼一來，人類將會避免着多少罪惡，戰爭和死亡，多少困苦和災難呵！」\*

盧騷以爲，祇要在歷史上出現這麼一個人，在這個人的腦子中出現這麼一個思想，劃起一塊土地和他圈將起來，並說這是我的，便會產生私有財產制度，即整個現代制度奠定了。

可是假如找到另外一個人，他阻止了這個狂徒，那麼照盧騷看來，歷史便會走上別一條道路，和不會有不幸了。盧騷以爲，倒楣的是沒有這樣的人曾經做了這件事。

盧騷說，事情既然到了如此地步，即人們允許了不公允的社會制度底產生，既然在當時沒必要的人起來將歷史引入正確的道路，那麼這便應該在現在來做。怎樣做呢？

很簡單：應該想出最正確的社會制度底體系。應該找得『聰明的皇子』使他充滿改造社會底必要底思想——改造就會完成，歷史便會改變進程。歷史發展底力量就在聰明人物和領導他的觀念。

\* 盧騷：不平之原因，第六八頁。

十八世紀底英法啓蒙學者對於社會科學底進步發展會做了不少貢獻。他們的「社會公約」底理論雖然有着唯心論的性質，可是是進步的；它結束了社會制度天定的封建學說，它證明了這些制度底地上的人間的根源。

● 他們提出了極有成果的思想，即推動社會人類行動的力量就是他們的利益。他們沒有能够正確地規定這個利益底本性而把它歸結爲意見和觀念。可是這個思想，後來會爲復辟時代法國歷史家具體化爲「階級的利益」，然後再爲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論證和發展。可是，法國唯物論者總還沒有理解人類歷史底真正基礎和沒有發現人物在歷史上的真正作用。他們誇大了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他們沒有理解人民大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結果歷史在他們的描述中成了偶然性底亂堆。一切歸結於傑出的歷史人物底是否出現。他們不知道歷史人物從何而來，爲什麼東西所推動。

在對歷史發展底真實基礎沒有正確理解之下，在對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沒有正確理解之下，科學共產主義是不能發生的。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就出現了社會主義理論家底光輝的星羣。從十六世紀底烏托邦主義者湯麥斯·摩爾起至十八世紀之初的偉大的烏托邦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歐文）止，烏托邦主義者對社會主義觀念底發展和現存的資本主義秩序底批評做了許多貢獻。

可是，他們全都是唯心論地對待社會現象，他們沒有理解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

用，沒有看到社會底物質基礎，把全部歷史歸結爲觀念的發展，認爲離開人民而獨立的、只以自己的觀念爲領導的人物是歷史底唯一的推動者。烏托邦主義者在解釋社會上同樣是站在唯心論底立場上的。

湯麥斯·摩爾在其名著烏托邦中，指出了社會中的一切無秩序底發生是由於私有財產底存在，「因此——摩爾寫道——我堅信以平均的和公允的方式分配資料和在人們事業進程中的幸福祇有在私有財產完全消滅時才有可能」。\*

用什麼方法可以改變現存秩序和消滅私有財產呢？

按摩爾底學說，祇要人們懂得沒有私有財產將生活得更好，便能達到這點。一切任務歸結爲應該適當地重新說服、教育、啓蒙人們。

法國烏托邦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光輝地批評了資本主義秩序。可是當提出如何消滅這些秩序時，傅立葉和聖西門回答道：祇有經過教育人們才能消滅這些秩序。而按照他們的意見，在新秩序創造上的主要的推動者將是有力和有影響的人。

例如，傅立葉想過，如果他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著作爲某一富人或某一國家的統治人物——某一皇帝——讀了並且他們相信了他們的學說底正義性，那麼他們便會起來實現傅立葉底觀念——世界將會在新的原則上加以改造。

傅立葉對拿破崙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曾想過，拿破崙將信服傅立葉底社會主義底正

\* 湯麥斯·摩爾：烏托邦，第九一頁。

義性和實現這些偉大的觀念。

「民衆們，你們的預感將被完成；最偉大的英雄預約着最光輝的使命，他將在野蠻和文明底廢墟上建立起普遍的協和。」——傅立葉關於拿破崙曾經這樣寫過。

傅立葉對於拿破崙底期望，當然沒有達到。傅立葉就找尋這類富翁如英國人諾爾頓、貝蘭和俄國大公施利米梯夫讚助，可是同樣毫無成就。傅立葉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宣佈了每天正午十二時的時候將在家中，之後，他直到臨終每天這時候都在等着實現其改革計劃之富翁之來臨。

歐文在實現自己的社會主義計劃上，對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抱着很大的希望，期望她能領悟他的觀念和根據這些觀念來完成社會底社會主義的改造。

社會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在歷史唯物論底歷史準備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聖西門理解了階級鬥爭底意義。他說出了這個思想，即以社會主義的關係代替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生產方式底更迭。他近於這樣的思想即社會發展底基礎生產方式。

可是，正和別的烏托邦主義者一樣，他沒有站在正是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底決定的力量這一唯一的正確觀點上。聖西門說，生產藉工具之助才能實現，而工具則是人的理性所創造的。從此，也得出結論說：理性、觀念決定歷史底進程。歷史過程底主要代理人是觀念底創造者，有教育的人們，知識分子，「聰明的皇帝」，英雄等等。

這樣，馬克思以前的科學沒有能夠走出對於歷史和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唯心論觀

點底界限。

這個唯心論的觀點同樣亦統治於現代資產階級的社會學中。

敵視馬克思底歷史理論的資產階級社會學，實質上至今還是輾轉於在馬克思以前的著作家所寫的關於社會科學問題的唯心論觀點的圈子內。

例如新康德派李凱爾脫——維別爾底理論在現代資產階級的社會學中是非常流行的。

這個社會學者底出發點是歷史發展是不服從任何規律的。作為康德派，他們一般地認為任何規律都是人的理性所創造的，由人加到現象上去的。這些新康德派說，祇有在自然科學底領域內人可以概括現象和把他們放到規律之下，因為在自然中，人所有興味的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一般的典型的諸要點。就是說，自然科學是可以確立規建底科學。而歷史事變是單個的、不重複的，它們不容許概括，不能把它們放在一般的規律之下。李凱爾脫和維別爾說，所以社會科學不能確定任何規律。他們的任務祇在描述個別的分散的歷史事實，並從其中選出有『文化的』『道德的』『觀念的』意義的事實來。對於這些反動的唯心論者，那些歷史事實是有這類意義的呢？是那些不是民衆，不是人民，而是『觀念』『文化價值』底創造者——各種『英雄』，不依賴人民的個人——按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創造歷史的人物所發動的事實。

李凱爾脫說，對於歷史學家重要的不是弗烈特里赫第二底軍隊中的普通士兵，而是弗烈特里赫本人。士兵如動植物標本中的一件，其重要不是其每個本身，而是其典型性。



因此，實質上說來，他們既與社會學無關，亦與歷史無關。與歷史有關祇是不再重現的歷史人物——弗烈特里赫第二。

祇有英雄才創造歷史，而不是人民——這便是李凱爾脫和維別爾底真正觀點，這是早已被推翻了、過時了的、古老的，可是對於現代反動資產階級思想家是可接受的觀點。

俄國民粹派思想家——拉芙洛夫和米哈依洛夫斯基發展了和李凱爾脫主義相類的幾乎一樣的觀點。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說：

『……民粹派對於全部人類歷史進程都持着錯誤而有害的觀點。他們不知道，不懂得社會底經濟政治發展規律。他們在這方面是些完全落後的人。照他們的意見，歷史不是階級所創造，不是階級鬥爭所創造，而只是個別傑出人物，即所謂「英雄」所創造的；羣衆、「羣氓」、人民和階級是盲目地跟着這種「英雄」走的。

拉芙洛夫正和李凱爾脫一樣，不過比他更早就斷言，歷史上規律性是不可能的，歷史有着不再重復的——個別的性質。和李凱爾脫一樣，拉芙洛夫證明，歷史事實底不重復性底根源是在歷史事實完全是不再重現的英雄人物底事業，『批判地思想的人物』底事業，他們是歷史底主要推動者。拉芙洛夫是唯心論者，因而他把歷史進步完全歸結爲知識底進步，並因此認爲進步唯一推動者是知識分子。『……不論人類底進步是如何少——拉芙洛夫寫道——可就是現有的這一點兒，亦完全是在批判地思想的人物身

上；沒有他們這些進步亦無條件地不可能的。」\*

從拉芙洛夫和米海洛夫斯基底觀點看來：人民不是歷史發展底積極的動力。按他們的意見，人民是一大堆人，其間沒有任何互相關係，是個人底機械集合體，「英雄」可以把它像泥土一樣來任意的塑造任何東西。民粹派「認為大眾是羣氓，認為只有英雄才能創造歷史並把羣氓變為人民。」\*\*

民粹派底這些理論是他們的個人恐怖底最有害的策略底直接論據。既然歷史是英雄創造的，人民祇是愚衆，祇會模倣英雄。按照這個理論，那麼，「英雄」應該完成一切英勇的行爲，而民衆祇有消極的追隨英雄，模倣他們。

這是根本敵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對於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是最有害的烏托邦，它解除羣衆底武裝，散佈幻想。以爲像專制制度這樣一種巨大的東西，可以無需羣衆的參加，單靠「英雄」、批判地思想的人物就能把它打坍似的。

九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來反對這些民粹派關於「英雄」在歷史上的絕對作用的反動理論。

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會有許多唯物論地解釋社會現象的企圖。可是這些企圖底大部

\* 拉芙洛夫：歷史書翰選集卷一，第二二七頁。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六頁。

分或者歸結為將人類和自然作粗暴的簡單化的比擬，或者把從歷史唯物論那裏抄襲來的觀念庸俗化。在這兩種情形下，這些企圖底內面都是想用否認人類活動，否認人物底能動性在歷史過程中的意義，用否認為着改造社會制度而進行的積極的革命鬥爭的意義來使資本主義制度永久化。

例如，在資產階級圈子內極有名的英國社會學者斯賓塞爾把社會生活和有機體生活等同起來。他把有機體生活底規律完完全全地移用作社會現象底規律。

斯賓塞爾說，假如有機生活發展底最高形態是人，那麼社會發展底最高形態便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

斯賓塞爾說，如果在有機體中有動脈，那麼在社會中亦有類似動脈的東西。『難道鐵路不就是動脈麼？』——斯賓塞爾問題。

假如有有機體中有神經系統，那麼，在社會中亦有神經系統，斯賓塞爾說，難道電話線和電報線不就是社會底神經系統麼？

假如在人的機體中有手，那麼，在社會中亦有有手的，難道工人階級和農民不是應該為社會工作的手麼？

人有頭，社會亦有頭——政府。

斯賓塞爾是革命底鮮明的公開的敵人。他說，大概不會有人殺了別人的頭而後希望這個人健康的。而在社會中可有這樣的人——革命家——他們想割去社會底頭，推翻政府，並以此來求得社會底健全。

斯賓塞爾做出結論說，資產階級政府應該萬古長存而社會主義者反對資產階級政府底一切思想是蠢事。

試問，在這種社會觀點之下，歷史人物，人底意志和意識有什麼樣的作用呢？毫無作用。

如果從唯心論者底觀點看來，任何社會規律都是沒有的，社會過程實質上是任意的過程，其中傑出人物隨心所欲地、任意地、只按自己的志願行動着——那麼對於斯賓塞爾型的資產階級歷史家，則在人類社會中一切是這樣地預定了的，一切都自己按自己進行，人們除了坐着和等待將要來的事，坐着和等着事物底自發過程把他引導前去外，無可作爲。

這樣便產生了有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宿命論，它否認人在歷史過程底進程中的任何作用。這類宿命論底代表者之一，布赫納寫道：

「已經好幾天了，我每分鐘都握着筆，可是寫不出一個字來。我研究了革命史。我感覺到自己好像是被歷史底可怕的宿命論所壓倒了。我在人的天性中看到可厭的平凡。而在人的關係中則看到一般地屬於一切人和部分地不屬於任何人的不可克服的力量。個別人物只是浪潮表面上的水沫，偉大——祇是偶然，天才底權力——只是木偶的喜劇，反對鐵的規律的企圖是可笑的，這規律至多只能認識它，可是決不能使它服從自己的意志。」\*

\* 引自普列漢諾夫全集卷七，第一九一頁。

以斯特魯威爲首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在九十年代在俄國發展了類似的宿命論。他們證明資本主義在俄國自然地、自發地和必然地發展着，工人階級只有『替資本家種菜』，而無論如何不要創立自己的政黨和不要開始反對資本家底鬥爭。

俄國的『經濟派』否認理論和覺悟性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第二國際底理論家和沙哈諾夫式的俄國孟塞維克證明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是以『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底自發的自流的發展和不要羣衆底革命鬥爭來完成的——所有他們都是站在庸俗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關於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上的宿命論的立場上的。

他們援引馬克思底歷史唯物論，可是實際上，他們是庸俗的『經濟唯物論』底信徒，這理論否認觀念在社會發展中的組織和改造的作用，否認民衆以及傑出人物在歷史上的積極的和創造的作用。

歷史家和社會學者在自己面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社會生活是由什麼決定的？人們社會生活底基礎是什麼？什麼東西迫得人們在一個時代這樣行動，在另一個時代另一樣行動呢？

例如，怎樣解釋在中世紀統治着宗教的宇宙觀，而在以後的時代又進行了反宗教意識形態底鬥爭和宗教退居了第二位呢？

怎樣解釋在一個歷史時代政權底統治形式是絕對專制制，而在別一個時代是共和國呢？

怎樣解釋在一個歷史時代統治的經濟制度是奴隸制，而另一個時代——封建制度，第三個時代——資本主義呢？

所有這些偉大的歷史事變和人民生活之中的巨大變更的原因在那裏呢？

如果我們所已經看到的，馬克思以前的和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不會能够回答這個問題。其原因，除了社會學者底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之外，還在於他們的社會觀底唯心論以及非辯證的反歷史的對待社會。

工人階級的偉大導師馬克思另一樣地去對待人類社會。

追隨着他所創造的辯証唯物論，馬克思認為，社會生活底一切現象底基礎應該在這個生活底物質條件中去找尋，因為正是物質條件是人們社會生活底決定的契機。

馬克思在生產方式上找到了社會底物質基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演說詞中說：

『正如達爾文發現了有機世界發展底規律，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底規律；他發現了直到如今被意識形態底層蓋所隱祕着的這個簡單的事實，就是，人類在能够從事於政治、科學、宗教、藝術等等之前，首先必須吃、喝、穿、住。』\*

爲了生活、存在，人們應得，第一，生產物質財富。爲了這，他們應該有勞動工具和生產經驗。爲着這，第二，他們應該共同地生活，因爲任何生產和一般地人底生活在社會之外是不能設想的。

\* 馬恩全集卷一五，第六五二頁。

物質生產過程就是人底社會生活底基礎基礎。正如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所極妙的說明的一樣，決定社會制度底性質和社會發展從一種制度到另一種制度的決定力量是：

「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產工具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

馬克思主義說，如果必需解釋不同時代的不同的社會制度(例如，爲什麼在一個時代有奴隸佔有社會，另一時代——封建制度，而後到來了資本主義；爲什麼在一個時代存在着一种政治制度，而在另一時代——另一種，爲什麼在一個時代人們認爲一種現象是道德的，而另一時代則另一種)，那麼，所有這些社會生活中變化的原因應該在生產方式中、物質生產過程中、社會底經濟生活中去找尋。

生產方式是社會底經濟基礎，社會底經濟根據，其上建築着這類上層建築，如國家制度、法權、道德、宗教，藝術、科學、哲學。跟着生產方式底變化，變化着社會的上層建築，變化着國家制度，變化着宗教、道德、藝術、科學，變化着政治理論和人們底觀點。

某一時代的政治制度底性質，統治於某一國家的道德、風習、理論，歸根結底是決定於生產資料在誰手裏，在那一個階級手裏，誰是生產資料底主人。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五一頁。

假如資產階級是主人——那麼將會有一種政治制度；假如無產階級是主人，那麼將會有另一種政治制度。假如資產階級是生產資料底主人，那麼，整個社會制度將會是資產階級的，而統治的意識形態將會是資產階級底意識形態；因為，如馬克思所說，統治階級的觀念是統治的觀念。在工人階級統治下，社會制度亦將是另一樣的——無產階級專政——，而統治的意識形態將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認為意識是物質底產物，並且只出現於物質發展的一定的高級的階段上。應用這個哲學唯物論底論點到社會上，馬克思發現了，在社會中同樣是物質存在、經濟基礎是第一性的，社會意識——第二性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假如必需解釋某一民族底社會意識中所發生的變化，那麼，這些變化底根本原因，不應該在社會意識本身中去找尋，不應該在人們（即使是傑出人物）底頭腦中去找尋，而應該在社會底經濟生活中，物質財產底生產方式中去找尋。

例如，假如要解釋，為什麼在十八——十九世紀封建農奴制的德國出現了人類思想底最偉大天才——歌德、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那麼，這個現象底根本原因，只能在當時德國生活底經濟條件中找到。由於當時德國底民族的分散，德國資產階級曾是經濟上薄弱的、脆弱的、怯懦的、政治上從屬於德國的封建主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幹部不論在國家機關和軍隊中都不能找到使用其知識的地方，因為那裏為貴族們盤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向了唯一容許他們的地盤——文化、哲學、文學底領域。在這些領域內，它創造了巨大的高漲，可是它正是適合於它的階級地位而表現了它：調和



地、怯懦地、混雜着新和舊、唯物論和唯心論、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混雜着先進思想底勇敢和卑下的庸人精神及對封建教會的匍伏。

爲什麼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在俄國不論在哲學和文化批評領域（伯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洛柳勃夫）中，不論在文學、音樂、科學領域中，都出現了整批的人類文化底偉大代表呢？爲什麼在落後的農奴制的俄國這類天才能够得到發展呢？

這些現象的原因，歸根結底應該在俄國底經濟發展中去尋找，就在俄國發展着進步的資本主義關係，而專制——農奴制度阻止着它的生長，就在俄國掀起了反對農奴制的農民的有力的革命潮流。在這個運動底浪潮中就生長了十九世紀下半期俄國社會先進階層中的顯著的文化高潮。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認爲，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是相反，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了社會生活底物質基礎，這便消滅把社會歷史生活看做是偶然性底混亂、衝突，看做是人物——英雄、皇帝、總長等底任意行動底絕無規律和重複性的舊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證明了在人類社會中正好像在自然界中一樣，作用着一定的規律，存在着現象底一定的重複性、規律性、存在着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的功績首先便在於他們發現了羣衆、階級底活動規律。恩格

「當說到研究那些歷史活動着底激動由此決定的原因，因此亦便是歷史事變底真正最後原因時，那麼，應該注意的，倒不是個別人物底激動，不管這些人物如何傑出，而是使廣大羣衆、整個民族或這一民族底整個階級進入運動的激動。而這裏重要的不是短期的爆炸，不是迅速過去的勃發，而是造成偉大的歷史變革的長期運動。研究那些在羣衆或其領袖（所謂偉人）頭腦中，鮮明或不鮮明地，直接地或在意識形態的形式中，甚至至在幻想的形式中被反映爲自覺的激動的原因——這就是說走上了引導認識統治於一般歷史或其個別時期或個別國家的規律的唯一道路。」\*

過去的『社會學理論』底缺點之一，歷史唯物論底創造者認爲是：這些理論沒有包括到羣衆底行動。只有歷史唯物論才給了可能以自然——科學的確切性去研究羣衆底生活和行動底條件。列寧寫道：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可是什麼東西決定人們，正是人民大衆底動機？什麼喚起矛盾的觀念和企圖的衝突？人類社會全部羣衆底所有這些衝突底總和怎樣？創造人們全部歷史活動基礎的物質生活生產的客觀條件怎樣？這些條件發展底規律怎樣？——對於所有這些，馬克思都會加以注意並且指出了科學地研究歷史——作爲一個在其全部巨大的多方面性和矛盾性中的統一的規律性的過程——的途徑。」\*\*

\* 馬恩全集卷一四，第六六九頁。

\*\* 列寧全集卷一八，第一三頁。

馬克思底發現：歷史過程底主要活動者是人民羣衆、是直接從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論點中（即社會底基礎是物質財富的生產）產生出來的。

既然社會底基礎是由生產組成的，那麼，顯然，誰是這個生產的完成者，他便是歷史底主要推動者。這便是勞動羣衆、人民、物質財富底生產者，人類社會底歷史首先是生產發展史，在歷史上彼此更替的生產方式底歷史。

「由此可見，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即身爲生產過程中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會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生產的那些勞動羣衆的歷史。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要想成爲真正的科學，便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爲帝王將相底行動，歸結爲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動，而是首先應當研究物資資料生產者的歷史，勞動羣衆的歷史，各國人民的歷史。」\*

馬克思主義說，人類社會底歷史首先是由勞動羣衆，物質財富底生產者創造的。他們在機器之旁，田野裏，當創造物質財富時，創造着歷史。他們之創造歷史，更在人類歷史的轉變時機，在社會震動的時機，這時候人民、羣衆、勞動者决定着鬥爭底結局。

馬克思所發現的勞動羣衆在歷史上的決定作用表示了歷史科學上的整個變革。實質上，它意味着歷史科學第一次才可能真正成爲科學。不限於歷史生活現象底表面上，而深入其本質，不乞訴於「英雄」底不可解釋的和任意的活動作爲最高審判者，而科學地、因果地解釋歷史人物底行動，確定他們在歷史上的真正作用和發現指導他們行動的

真正的原因和規律。

上面我們已經指出了那些歷史唯物論庸俗化者，如斯徒魯威、經濟派及各式各樣的孟塞維克，他們庸俗化馬克思主義，把它變成歪曲的孟塞維克的庸俗的唯物論，變成爲經濟唯物論。

實際上，歷史唯物論底理論，雖然認爲在人們全部生活底基礎上的的是生產方式、物質生產底過程，可是它絕不粗魯地和直接地將一切多樣性的社會現象絕對地歸結爲經濟因素。

在指明與這類歷史唯物論庸俗論底區別時，恩格斯寫道：

「依照唯物歷史觀，在歷史過程中決定的契機歸根結底是現實生活底生產和再生產。馬克思和我的主張不過如此。倘若有人把這個論點曲解爲經濟的契機爲唯一決定的契機，那麼會把這個斷語變爲空洞的、抽象的、無意義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上層建築底各種契機：階級鬥爭底政治形式及其結果——勝利的階級在取得勝利後所訂立的憲法等等——，法權形式，甚至這些現實戰鬥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學的、哲學的理論、宗教觀點及其進一步的發展爲教條體系都影響着歷史進程並在許多情況下有力地决定着它的形式。」\*

歷史唯物論和所謂經濟唯物論毫無相同之處，後者把全部歷史過程歸結爲單單一個

\* 馬恩通訊集，第三四七——三七五頁。

經濟、宣揚宿命論，否認上層建築對基礎的反影響，否認觀念對歷史的影響，否認人的意志，傑出人物底意識對歷史的重大作用。

與經濟唯物論相反，馬克思主義承認影響於社會生活全部過程的先進觀念，理論與學說底偉大的改造、組織和動員的作用。

先進思想底力量是特別偉大的。沒有先進的思想是在任何一個革命也不能完成的。不僅如此，先進思想先行於革命變革，準備它，促進它的到來。

在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前有着一大批著名思想家：福爾泰、盧騷、狄德羅、霍爾巴赫、赫爾維齊等。這些人把自己天才底全部力量用之於反對封建的農奴制的意識形態，給予它以致命的打擊，準備了先進的人們底智慧和意識，使他們準備好去參加革命。爲他們在觀念上所準備好的革命完成了並戰勝了專制主義。

如果列寧和斯大林的黨本身不以先進理論武裝着和不以這個理論去武裝人民大眾——工人階級和農民，那麼我們的十月革命便不能完成。

喚起蘇聯農村經濟底集體化的原因，首先是農村得到了新的生產力：新的技術和精通技術的人派到農村中去了。新的生產力首先規定了農村中的過渡到新的生產關係。除了在農村中創造新的生產力外，我們的黨堅持地求得集體化底觀念深入於農民之中。我們的黨站在這樣的觀點上，即農民應該自願進入集體農莊，而如果新的先進的關於集體生產的觀念不掌握農民的意識的時候，則要達到這點是不可能的。

所以，從馬列主義的觀點上，觀念雖然是爲人民生活底物質條件所制約的，可是在

社會生活中，它本身影響這個生活，並在其中起並不很小的作用。

可是觀念底創造者是人，而且是那些依自己的知識和經驗能够創造觀念，能够在現有的東西中概括將來的趨向並規定爲鬥爭的口號，能够以自己的決心、意志、毅力推動這些觀念到羣衆中去的人，並且這些人能够求得羣衆理解他們、追隨他們。

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既不否認先進觀念底作用，亦不否認先進的傑出人物底作用，知識分子底作用，民衆領導者在歷史上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承認這個作用，但同時它科學地說明這個作用底合理的基礎並且規定它的真正的範圍。

馬克思主義底敵人，以經濟唯物論底精神曲解馬克思主義舉出這類論據來：既然你們認爲在社會中作用着一定的物質的不依賴於人的意志的規律，和這些規律是不能任意地加以改變的，那麼，政黨底鬥爭就成爲無意義的了，革命家——爲消滅資本主義與爭取工人階級勝利而戰的戰士們底活動亦就成爲無意義的了。

例如，德國的社會學者魯道夫·施旦姆列爾在十九世紀之末出版的經濟與法權一書中曾寫道，馬克思主義是內部自相矛盾的。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爲社會是按照嚴格的一定的規律發展着的，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到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者組織政黨和進行政治鬥爭，推選自己的領袖等等。

施旦姆列爾寫道：如果社會根據與人底意志無關的客觀規律行進着，那麼，你們，馬克思主義者爲什麼組織政黨和號召工人階級鬥爭呢？

施旦姆列爾寫道：既然馬克思主義者教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那麼，應該等候它底死亡。施旦姆列爾寫道，如果月蝕是規律地和必然地到來的，那麼誰也沒有想要組織月蝕黨以促進月蝕來得快些。

這個列子很廣大，地為馬克思主義底敵人利用着，他們以為想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致命的論據來了。實際上，這個問題與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問題毫無關係。

馬克思主義承認歷史發展底規律性，承認歷史發展底規律是離開人的意志而作用着的。它決定這個意志以及人底觀念。可是馬克思主義絕不否認社會歷史是為有一定的意識和意志的人所創造的。

關於這個問題恩格斯曾說道：

「歷史是這樣地被創造着的，即最後結果是從許多個別意志的衝突中獲得的，而每一意志底表現為這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的情況。因此，有着無限的互相交叉的力，有着各種力底無限交叉的叢集，而從這交叉中得出一個一般的結果——歷史事件。這個歷史結果可以被看做是一個完整的、不自覺的、無意志的作用着的一種力底結果。因為一個人所希望的東西，碰到別的人的阻礙，而結果則出現的東西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這樣，歷史至今就是類似自然——歷史過程而進行着而在本質上服從於同一的運動的規律。可是從這一點，即個別人的意志——這意志表現着一個人底身體體質和外部的、在結局上是經濟的（或自己個人本身的，或者一般的全社會的）環境在他身上所促成的願望——不能達到他所希望的東西而消解在某一般的東西中、一個總的結果

裏，從這一點却不能得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地，每一意志都在總的結果中加上自己的一份，因之亦便被包括在總的結果中。』\*

施且姆列爾所說到的月蝕底到來是不依賴於人的，因為月球和地球底運動不依賴於人的意志。這個例子與人類社會底歷史毫無關係。相反地，當我們說到社會發展中的規律性時，我們說的是這樣一種現象，這種現象是在人底活動底基礎上發生的。歷史過程不是離開人而是由於人的活動而完成的。所以人的活動、意志、意識絕不等於零；而在歷史上起一定的作用。這個作用可大可小，取決於意志是怎麼樣的意志、某一歷史人物活動底規模如何、他的知識怎樣、他的預見事變和影響羣衆的能力怎樣。

對於在馬克思主義的解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有最重大意義的是正確的辯證的解決偶然性與必依性以及自由與必然的相互關係的問題。

形而上學者在這些問題上站在片面的立場上。他們說，或者偶然性——或者必然性；或者意志底自由——或者必然性。如果有偶然性，就是說沒有必然性，一切都是偶然的。如果沒有偶然性，就是說，一切都只是必然的。如果有意志自由，那麼就是說，沒有必然性。如果有必然性，那麼就是說，沒有自由。形而上學者分裂自然現象，看見其間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制約。

\* 馬恩通訊集，第三七六頁。



馬克思主義者與形而上學者不同，承認在歷史上作用着必然性，客觀的規律性，而同時不否認在歷史過程中有偶然性的存在，偶然性在歷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馬克思說：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麼歷史將有異常神秘的性質了。當然，這些偶然性本身作為一種組成部分而加入於發展底一般過程中，為別的偶然性所均衡。可是加速或延遲在有力的程度上取決於這些「偶然性」，其中同樣有這類偶然性，如在開始時站在運動先頭的人底性格。」\*

試舉幾個例子吧。

大家知道，俄國最後一個沙皇，尼古拉第二，是一個大白癡。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他的皇位已經動搖，在對於俄國專制制度最悲劇的時機，在專制制度存在底最後一刻，尼古拉在日記上寫道：「今天殺死一隻烏鴉。」這個白癡不去想一想他還有幾天好活，而寫下一筆「殺死一隻烏鴉」！

雖然，在俄國聰明的沙皇並不多，可是應該說，這類情形，即最後一個沙皇是白癡，當然是一個偶然性，這是偶然的現象，即不是從俄國現實底本質中產生出來的現象。

可是這個偶然的情況，即俄國最後的一個沙皇——尼古拉是一個白癡，在俄國的歷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歸根結底便利了沙皇制度底粉碎，加速了它的瓦解和崩潰。

另一個例子，在十八世紀中期，法國的皇帝是路易十五。這個路易十五以輕浮和私自利著稱。當法國進行七年戰爭的時候，在路易十五軍隊底運輸隊中娼妓和輕佻的女人多於戰鬥單位。歷史上有名的，路易十五是完全處於自己的寵姬侯爵夫人保拜都爾底影響下的，她會能够強迫路易十五任命任何一個傻子爲法國底總司令。例如，她會獲得路易十五任命無能的將軍蘇比茲爲總司令。這位蘇比茲屢戰屢敗，結果社會輿論羣起而攻之。可是她還能在皇帝面前保護自己的情人。「可是，你什麼都不要怕，——她給蘇比茲寫道——我將關心你的利益並設法使你和皇帝協調起來。」蘇比茲依舊做他的總司令——而法國則在戰爭中遭受了失敗。

試問，這種情況是否是必然的呢，即路易十五會是一個淫蕩漢而法國實際上爲皇帝底情婦侯爵夫人保拜都爾支配着，當然，不是的。這是一個偶然性，可是它在法國歷史上印上了自己的烙印。

再從別的領域中舉出一個例子來。在一九二三年在日本曾經發生了地震。它絕不是從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的制度中產生出來的，對於日本底社會制度。它並不是一種必然性。所以，地震對於日本的社會制度是一種偶然性。可是它，影響了日本底社會生活，使日本軍閥底帝國主義計劃底實現遲滯了好幾年。

再舉一例。對於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的法國的規律性發展，下列事實，是否非一定如此不可的呢，即正是拿破崙成了應該在法國消滅革命而同時只保留着對資產階級有利的那些革命成果的人呢？不，不一定的，可以由別的人來替代拿破崙。這一

作用正爲這個特定的人——拿破崙——所完成，乃是一種偶然性。恩格斯說：

「正是這個偉人在這一國家，在一定的時候出現，這種情況是一種純粹的偶然性。假如我們劃去這個人，那麼便有以別的某一個人來代替的需要，而且這種代替人會找到的。不論好壞，只要經過一些時間就會找到的。而拿破崙是科西嘉人，正是他成了軍事獨裁者（這對於爲戰爭累得精疲力盡的共和國是必然的）——這是偶然性。可是如果沒有拿破崙，那麼，別的人將會完成他的使命。這是無疑的，因爲永遠是當要求這樣的人時，他就會被找到：樂查爾、奧古斯脫、克倫威爾等等。」\*

如果拿破崙在他成爲法國皇帝以前就打死了，那麼別一個資產階級利益底表現者將會代替他的位置。開始時拿破崙會有這樣的競爭者，如邵比爾、馬洛、麥克唐、貝爾那都脫。只在後來，他排除了他們並佔據了首席。

所以，被選拔出來的正是拿破崙而不是別人這是一種偶然性。可是無疑的，這個偶然性影響了十九世紀之初的法國歷史，而且不僅法國的歷史。

偶然性在歷史上是起作用的。雖然它們不是必然地從規律性的歷史發展中產生出來的，可是，既然它們存在了，發生了，他們便給規律性的歷史發展底基本路線底進程以影響。他們被包括於必然性底鏈索中，他們有時成爲這個必然性底重大的契機。

可是馬上應該說明，它們不能完全取消必然性。偶然性作用於必然性底框子內或者

阻滯或者加速事變底必然的進程。歷史人物可以有力地影響歷史事變底進程，可是正在一般條件、一般趨向、特定的必然的規律性的歷史過程底框子內。

這種偶然性，如路易十五底淫蕩之可能出現於法國歷史上，正是因為當時法國的封建制度處在崩潰底狀態中，專制主義動搖萬狀、社會底貴族上層分子腐化了等等。

在這種環境下，任何墮落者、冒險家、飯桶都可以獲得勢力。法國經濟發展底一般傾向——封建制度底衰落，資本主義底發展促進了這點。路易十五以自己的行動加速了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在法國底破產。

在俄國在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前夜站在國家首腦地位是各色各樣的拍馬家和墮落人物，如尼古拉第二、亞歷山大、拉斯普丁、普洛托樸樸夫等人，其原因亦正是因為專制制度在俄國腐敗了，貴族統治階級腐敗了，總之，專制制度死亡前夜底一般條件會是這樣的緣故。

不可爭論的，拿破崙對於法國底歷史會有很大的影響——他的影響在很久以後還可以看到。可是假如沒有拿破崙，法國歷史底一般發展還是一樣的，資本主義將繼續其發展，從封建——農奴制羈絆下解放出來了的法國資產階級將選拔出別的幹才的軍人來擊破反動國家底軍隊。

如果在俄國沒有彼得第一，俄國底歷史發展是否走上同一的道路呢？還是俄國將依照別的歷史方向發展呢？

資本主義在西方底出現，軍事技術在西方的增長，在俄國統治階級面前，在那在十

七世紀——十八世紀邊緣上站在俄國首腦地位的人面前直接地提出問題：假如你不願在西方國家面前屈膝，那麼你便應該武裝起來，改組、創立新的軍隊，新的技術，創立自己的艦隊等等。如果當時站在俄國首腦地位的不是彼得，而是另外的一個人，那麼，也許所獲結果要小些，所費時間要長些，可是提放在俄國面前的任務仍舊將被完成的。彼得有巨大的毅力、智慧、決心，可以促進俄國在較短時期，以較大結果來走完這段路——可是對於當時的俄國別的路是沒有的。

如果沒有庫圖索夫，俄國軍隊能否在一八一二年的祖國戰爭中戰勝拿破崙的軍隊呢？俄國軍隊能否把拿破崙趕出俄國嗎？

爲了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應該記得俄國從法國侵略之下的解放會是全民的事業。整個俄國人民會一致奮起保衛俄國底獨立，俄國的農民會舉行起義反對拿破崙底侵略軍隊。農民創立了游擊隊，拿破崙的軍隊吃了游擊隊的很大的苦頭。俄國農民中的情緒是戰鬥的和不可調和的。

在俄國農民底這種情緒之下，在對外國敵人、外國奴役者這種仇恨之下，法國軍隊不論怎樣都要被趕出俄國去的。

庫圖索夫更巧妙地，也許更少損失力量地解決了這個任務，可是一般的歷史進程將會是一樣的。雖然，或許會更困難些，拿破崙可多得一些勝利，多佔俄國一些地區。

在十七世紀在英國封建制度腐朽了。可是爲了粉碎它，還需要力量。克倫威爾站在這個力量的領導地位，這個人，用恩格斯的話來說，結合了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於一

身。克倫威爾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是很大的。可是克倫威爾之所以能起這個作用，是因為曾經有適當的條件，這些條件要求有這類的領袖和決定了他們的活動的方向。工人之子——林肯是一個偉人並且給了美國前途以巨大的影響。在他領導下，北方諸邦戰勝了蓄奴的南方諸邦。林肯是為美國的民主秩序而鬥爭底組織者。可是林肯之所以能夠完成這個任務是因為在十九世紀中期在美國成熟了為改革所需的適當的條件，曾有改革底需要和需要一個能夠實現這一改革的人。

達爾文是一個天才的人物；他在科學上完成了偉大的事業，論證了進化論。可是達爾文之所以能夠完成這類偉大的發現是因為科學在他以前就已經走上同一的方向。下述事實就是這一點底證明，即與達爾文同時和達爾文無關地，另一個英國學者威爾斯亦曾經發明了進化論。達爾文底天才就在他更好地更完全地闡明了在他以前就已經萌芽了的思想。

馬克思底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他創造了科學共產主義底理論。這只有馬克思這樣的天才才能完成。可是我們亦不應忘掉列寧所說的：

「馬克思底全部天才就在於他給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了的問題以回答。他的學說是作為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底最偉大的代表們底學說之直接繼續而產生的。」

關於這個問題恩格斯亦說過：

「假如唯物史觀是馬克思所發現的，那麼梯葉里、米尼厄、基佐，一八五〇年以前的所有英國歷史家證明了許多人都曾企圖達到這點，而摩爾幹之發現同一的歷史觀就指明了，時間成熟了，這種歷史觀應該被發現出來。」\*

我們知道，歷史發展到十九世紀中期引導到工人階級日益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走上歷史舞台，工人階級底意識形態將必然地產生出來。科學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利益底和歷史發展規律底最正確的反映——應該出現了，而且真的出現了。這並不絲毫減輕馬克思底歷史作用，他的天才的意義。恩格斯說：

「最近人們不止一次地指出了我底參加這一理論底製定。因此，我不得不在此地說幾句話以闡明這個問題。我不能否認，我在以前，在我與馬克思接觸的十年間，曾獨立地翼助了我們所說的這個理論底奠定，主要地是這個理論底闡明。可是，基本的、領導的思想底最大部分——特別在歷史和經濟底領域內，以及他們的最後的尖銳的定式是完全屬於馬克思的，我所加添的東西，馬克思可以無需我而輕易地充實起來，也許有二三專門部分可為例外。而馬克思所做的，則是我永遠也不能做的。馬克思較我們大家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觀察得更廣闊和更迅速。馬克思是天才，我們則最好亦不過是幹才。」

沒有他，我們的理論決不像現在這樣。所以，這理論公允地用他的名字來稱呼。」\*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成爲科學共產主義底創造者，是因爲他們是天才。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勞作回答了十九世紀社會所提出的歷史發展底要求。

列寧——馬克思和恩格斯底事業底繼承者是歷史上最天才的人物。而同時俄國就成了列寧主義底故鄉。不是偶然的，正是在俄國出現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死後產生出來的新條件之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如果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世界革命運動底中心是在德國，那麼在二十世紀之初，工人階級革命鬥爭底中心已經轉移到俄國了，因爲帝國主義時代底一切尖銳的矛盾正是集中在俄國。所以，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故鄉。所以，列寧成了俄國以及全世界工人階級利益底表現者。

正因爲列寧是馬克思主義底繼承者和馬克思主義發展上的新階段底奠定者，這一點給了我們的理論以偉大的力量。沒有一個人，能够像天才的列寧一樣，以這樣的力量和這樣的成功來完成這個任務。列寧主義是有力的武器，不可戰勝的理論。歷史永遠不會忘掉作爲新時代中馬克思主義繼承者和世界上第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的列寧底作用。

所以，人物在歷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 馬恩全集，卷一四，第六六二頁。



人物可以改變事變底個人的特點，可以給這些事變以一定的特性。傑出的人物可以阻滯或加速歷史事件，可是不能改變歷史規律，不能改變歷史發展底整個方向。

不管歷史上曾出現了多少天才，不管他們怎樣堅持農奴制，可是既然是資本主義已經開始發展了，則農奴制早晚應得走到末日了。

不論多少「人物」起來擁護資本主義，可是當它已經走下坡路時，資本主義底滅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在歷史的不遠的將來了。

在解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時，應該從馬克思主義的、辯證的解決自由與必然的問題出發。

在唯心論的哲學學說中常常可以碰到這樣的一種斷言，即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之所以成爲決定的力量，就是因爲人的意志底自由是毫無限制的，人的意志並不服從任何必然性，出現於歷史上的人物是任意地行動的，他願意怎樣便怎樣，他本身的意見告訴他怎樣便怎樣。頭腦中來了一個好思想，歷史便走上好的路；來了一個壞思想，歷史便走上壞的路。

如叔本華這樣的唯心論哲學家甚至認爲宇宙底一切存在是人的意志底表現，意志是一切底基礎，意志不僅決定社會底生活，而且決定自然底生活。唯心論者——尼采同樣站在這種觀點上。

站在這類唯心論的和意志論的觀點上，英國的社會學者卡爾來在其歷史上的英雄與

英雄事業一書中寫道：「……全世界的歷史，人在這個世界中所完成的事業的歷史，照我想來，實質上是在這裏在地球上勞作過的偉人底歷史……偉人的歷史組成了全部世界歷史底真正的靈魂。」

「找出——卡爾來寫道——在特定的國家裏最有能力的人來，把他放在最高地位，不變地尊敬他，那麼你便會得到一個十分完美的政府，而任何投票箱、國會的美麗演說、表決、立憲機關、一般任何機械是不能改善這個國家底毫髮的。」\*

與這相反，可是同樣是關於自由和必然底問題的形而上的解決的，是完全否認人底自由。這種否認人底自由叫做宿命論。上面我們已經引了這種宿命論者——布赫納底說話了。宿命論在宗教教派中有其地位，例如加爾文派說，意志自由是沒有的，因為一切人的行動都是為上帝所預定了的。回教亦完全否認人的意志自由。可蘭經教導所謂「天命」，人底行動為神所預定的，人好像是一個傀儡，神牽着線使他行動。

馬克思主義辯證地解決關於自由和必然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承認人底行動為必然性所規定的。這個決定人的意志的必然性，首先是人底生存底物質條件。人底觀念和情感是為他的生存的物質條件決定的。

承認這一點時，馬克思主義同時承認：人對必然性的關係絕不是必然性底簡單的玩具。上面我們已經引了恩格斯底話，人的行動本身作為一個契機加入了歷史發展必然

\* 卡爾來：歷史上的英雄與英雄事業，第二七六——二七七頁。

性底鏈索中。實際上，社會生活的必然性並非從天而降的，它是爲有意志和意識的人所創造的，雖然，在其結果上，在其總結上構成了這麼一種東西，它是不從屬於人的，相反，它決定人的行爲，成了對於他的必然性。

其次，馬克思主義承認人可以影響必然性。

人的意志不能由自己的任意去取消必然性底進程。例如，人不能按自己的任意『去倒轉歷史的車輪』，如像承認意志的完全自由的俄國民粹派所想的那樣。可是傑出的人物可以阻滯或加速事變底必然進程。人可以影響事變底進程。

爲着要影響必然性底進程，人應該認識它。認識了必然性底進程之後，人可以爲着自己的利益來利用它的規律，並依靠在這些規律上，去指揮必然性的進程。

自由是認識了的必然性。這個確定着自由和必然之間的辯證關係的論點，首先是由黑格爾加以發展了的。恩格斯說：

『黑格爾第一個正確地理解了自由和必然之間的關係。對於他，自由是必然性底理解。只有在它沒有被理解的時候，必然性才是盲目的。自由不是在幻想的離開自然規律的獨立性，而在認識這些規律並因此而可能有計劃地利用他們爲着一定的目的。』\*

在人還沒有認識必然性之時，在必然性還盲目地自發地作用着的時候，人底意志不是自由的。可是當他認識了必然性，他便得到了自由。他可以作用於必然發展的過程，

作用於必然性。

大家知道，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直接得到的是落後的經濟，而且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的結果，處於完全破壞的狀況中。西方的革命延遲了，經濟上完全破壞的蘇聯更處於資本主義的包圍中，這個現實乃是決定我黨政策底必然性。在最短時期內使國家工業化底任務是為嚴酷的必然性替我們規定了的。可是既然我們認識了這個必然性，既然我們理解了應該怎樣行動，覺察了我們應該向那裏去，認識了歷史必然性底規律並適合於這些規律而行動起來——這麼一來我們便得到了自由，從事於改變必然性，來為國家工業化，消滅自己的落後而鬥爭。

關於自由和必然的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証的估計給予正確解決下列問題底基礎，即人應該有些什麼品質才能放進歷史的傑出的人物底隊伍中去。列寧說：

「有定論底觀念是確定人類行為底必然性的，是推翻所謂自由意志底荒唐神話的，可是它絲毫也不消滅理性，也不消滅人的良心，也不消滅人底行動底估計。恰巧完全相反，只有在有定論的觀點下，才有可能作出嚴格的正確的估計，而不是把無論什麼東西都統統推到自由意志頭上，同樣，歷史必然性底觀念也不絲毫摧毀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毫無疑問地是活動家底人物底行動構成的。在估計人物底社會活動時所發生的真正問題，就在於，究竟在什麼條件下可以保證這個活動得到成功呢？究竟有什麼東西能担保這個活動不致成為淹沒於相反動作底汪洋大海中的孤單的行

動呢？」\*

從唯心論的觀點上，關於人物要成爲傑出人物、「英雄」應該要有些什麼性能這一問題是很簡單地可以解決的。「……個人的創造可以看做是人類精神進步底主要因素……」\*\*

這就是主觀社會學者對於人物要成爲歷史的傑出人物所應具的品質所能說的一切。對於主觀社會學者，歷史人物是一個謎。

例如，在卡爾來那裏，英雄是神聖的人物。英雄，這是上帝派到地上來的使者。卡爾來亦正是這樣寫的，英雄是上帝派來的使者，而一切他的事業，實質上是神所預定了的。

在自己的著作歷史上的英雄與英雄事業中，卡爾來以一章來寫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底領袖——克倫威爾。許多的不同政治觀點的歷史家關於克倫威爾曾寫道，他是利己主義者，有狐狸的狡滑，他是不誠實的，狡猾的，奸詐的人等等。而卡爾來證明：這一些都是絕不可能的：克倫威爾是英雄，所以他是上帝底使者。傑出人物就是完美的人物，他沒有普通人所有的缺點。主觀主義者這樣地描寫歷史！

大家知道，拿破崙是有許多使其左右不大好過的品質的。可是卡爾來證明，這是

\* 列寧全集卷一，第七七頁。

\*\* 卡列也夫：談宇宙觀之造成，第一六八頁。

不龍有的。拿破崙——這是偉人，傑出人物，英雄人物。既然是英雄人物，那他便不會有普通人所有的缺憾的。卡爾來寫道：「偉人及其直接從上帝手中得來的自由的力量乃是閃電。他的話是聰穎的救世真言，對他一切都可以信從的。當他語聲雷鳴的時候，一切都在這個人底周圍燃燒起來了，一切火光熊熊，正像他本身一樣。」\*

在這些觀點中，科學的氣味絲毫也沒有。這是否認歷史規律和歷史必然性的唯心論在歷史上鮮明的表現。

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揭露了傑出的歷史人物活動底真實的條件。馬克思主義說，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有着無數的有才幹的人物，在個別的人們身上包涵着無數傑出的才能。可是爲着要使這些才幹和才能能够表現起來，——爲着使他們表現自己的天資底可能變爲現實，爲着這點就必需有相當的社會條件。

我們知道，在俄國人民中埋藏着無數的有才幹的人，他們爲農奴制和資本主義所窒息、壓倒、粉碎。俄國人民這些幹才在舊制度底條件下不能展開起來。他們在蘇維埃政權下、在最廣大的範圍中、在人類活動底一切領域內展開起來了，展開到這樣的數量以致整個俄國以前的歷史不能與我們今天相比擬。

所以，爲着使傑出人物能在歷史上佔一定的地位，爲着他能够起一定的作用，爲着他能起傑出的作用，就必需相當的歷史條件。

\* 卡爾來：歷史上的英雄與英雄事業，第一八頁。

爲着使有天資的人，傑出的人物能够影響歷史生活底進程必需這些人物能回答社會發展底要求，適合社會進步力量底利益，社會先進階層底利益。馬克思主義說：

「不是觀念決定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是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人們底觀念。如果傑出人物底觀念和願望竟與社會底經濟發展背道而馳，竟與先進階級底要求背道而馳，那末這種傑出人物就會變成無用之物；反之，如果傑出人物底觀念和願望正確表現着社會經濟發展底要求，正確表現着先進階級底要求，那他們就能成爲真正傑出的人物。」

「當民粹派認爲大眾是羣氓，認爲只有英雄才能創造歷史並把羣氓變爲人民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者便回答他們說：並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也就是說，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進歷史，英雄，傑出人物，只有當他們能正確瞭解社會發展條件，瞭解應如何改進這些條件的時候，才能在社會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

所以，歷史條件、社會發展底要求——首先是前進發展底要求，人民大眾底要求——這些才使得傑出人物底出現成爲必然的。

歷史規律地發展着，人物底作用爲歷史規律和具體的社會條件所規定的。例如，如果在十五世紀，有這麼一個最有天才的人發現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那社會主義革命一樣地不會在十五世紀或者十八世紀發生的，因爲在那時候，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還

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底歷史的前提；沒有已經發展了的資本主義制度，沒有能夠完成社會主義變革的無產階級。不論這個人物是如何天才，他還是不能成爲人民大衆底領袖、傑出的歷史人物、英雄的。

如果，必然性本身，歷史時機本身提出了要求英雄，要求傑出人物時，情形便不同了。這裏便有着根據、基礎、必然性，以便出現能幹的有才幹的人物並能夠應用其才幹與能力。

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產生對於不同的人底需求。在法國十八世紀之末與十九世紀之初曾需要有決心和軍事才幹的人，拿破崙便是這種人。在十五世紀在莫斯科俄羅斯要求有這樣的莫斯科國家底領導者，他要有外交的才幹狡猾，要能夠以外交的方法來和金帳國鬥爭，在伊凡三世，第一個莫斯科沙皇身上找到了這樣的人，他完成了莫斯科國家脫離韃靼人而獨立。在一八一二年的祖國戰爭俄國要求有能夠以人民力量來反對外來侵略者的將領，他要能夠以熟練的戰術削弱敵人，使敵人上當，欺瞞敵人。庫圖索夫就是這樣的人。當時，有人問庫圖索夫說，他能否打敗拿破崙，他回答道，「打敗！不，可是，欺騙他——我預計着。」\*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對於領導者，對傑出的歷史人物提出不同的歷史要求。可是有一個決定的、基本的要求——這就是善於回答時代底要求，反映先進社會力量底利益

\* 布利索夫：庫圖索夫傳，第五頁。



和預見事變底進程。

善於預見歷史事變底進程，這就是說，以熟諳事務而行動，成爲自由的人，理解事變底客觀進程並力圖依據這客觀進程而行動。

假如我們說，自由是認識了的必然性，那麼這應該用到傑出的歷史人物身上去。假如，這些人是配得上這個稱號的真正傑出人物，那麼他首先便有自由地行動底才能，預見底才能，即根據對於事變底必然進程底知識而行動，理解歷史發展底總方向，理解社會前進發展底路線和社會進步階級底鬥爭任務。

普列漢諾夫說：

「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因爲他的個人特點使各個偉大歷史事變具有其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爲他自己所具備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於當時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響下所發生的偉大社會需要。卡爾來在其論英雄人民的名著中，把偉人稱呼爲發起人。這個名稱用得極其中肯。偉人確實是發起人，因爲他的見識要比別人的遠些，他的願望要比別人的強烈些。他把先前的社會理性發展進程所提出的緊急科學任務拿來加以解決；他把先前的社會關係發展過程所引起的新的社會需要指明出來；他担負起滿足這種需要的發起責任。他是個英雄。其所以是個英雄，並不是說他能阻止或改變客觀自然事變進程，而是說他的活動是這個必然和不自覺進程底自覺自由的表現。他的作用全在於此，他的力量全在於此，但這是種莫大的作用，是種極大的力量。」\*

\* 普列漢諾夫：論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唯真譯。

傑出的歷史人物——是這樣的人，他自由地行動，就是，他理解必然性，亦即，他理解社會前進發展底任務和依靠在先進的社會階級身上。

可是，如果歷史人物由於某種原因失去了預見力，那麼他將怎樣呢？

例如，如果他為階級的仇恨而瞎了眼睛，而「喪魂失魄」他反對歷史的規律的發展時，如果他起來反對先進的社會力量時，他將怎樣呢？

克倫斯基、鄧尼金、高爾察克及很多別的人的命運可以作為這個問題底回答。他們反對歷史的必然性，不理解事變底客觀進程，不理解歷史發展底進程。

他們反對歷史的必然性，保護死亡下去的剝削者階級的利益，反對人民，反對先進的社會階級。結果，他們為人民所拔除、殲滅、消滅。

托洛茨基——布哈林派爬蟲亦受到同樣的命運，這些人為着自我安慰起見，曾自認為「英雄」「領袖」，而實際上只是法西斯的小甲蟲。我們的人民消滅了他們。

「英雄和傑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確了解社會底發展條件，却竟不顧社會底歷史要求而胡作亂為，儼然以歷史底「創造者」自居，那他們就會變成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倒霉人物。」\*

這個論點公允地可以用之於所有那些違反歷史底必然發展的「歷史人物」。不管他們目前是如何有力，早晚他們要被揭破為渺小的、可笑的和誰也不需要的失敗者——而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二七頁。

將被拋入歷史底垃圾箱中去。

這對於反動的社會階級底活動家尤其是公允的。這些人不能成爲真正傑出的人物，因爲他們代表的不是前進的，而是反動的社會階級底利益。他們的任務是抓住過時的死亡下去的過去的東西，只是保護落後的東西。他們害怕將來，不理解它，仇視它。因此，這些人不能稱爲傑出的歷史人物。這是歷史上暫時的人物。早晚他們將爲歷史發展底進程所揭破和壓倒。尼古拉羅薩沙皇寶座時，看來像是一個大國底偉大和有力的皇帝。他爲階級的仇恨蒙蔽了眼睛，瘋狂地反對人民。後來他從沙皇的寶座上推翻下來了，那時，他在全世界面前顯露了他是渺小的白癡、墮落者，可憐的小甲蟲底可厭的面貌。這個同樣的命運正爲一切其他的甲蟲們：希特勒、墨索里尼、法朗哥等等準備着。現代反動資產階級提拔有名的小人：叛徒、墮落者爲自己的領袖。它的領袖有如下

的品質：殘暴，無恥的賣身，對工人階級的瘋狂的仇恨及由此而產生的無希望的盲目。這些一時的暫時的過渡的人物，結局將會被那引導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必然勝利的鐵的歷史必然性所消滅。

甚至有天資的人，不論他如何有才幹，如果他起來反對歷史的進步力量，反對先進的階級，那麼，歸根結底，他將變爲渺小的可憐蟲而不是偉大的歷史人物。

在和德國作家愛彌爾·路得維希談話中，斯大林在把彼得大帝和偉大的十月革命底領袖列寧比擬時，說道：

「至於列寧與大彼得，那麼後者只是大海中之一滴，而列寧乃是整個大洋。」\*  
是的，工人階級底這類領袖，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較之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傑出的人物是不可比擬地更高的。過去歷史上的最傑出的英雄較之工人階級、勞動羣衆、一切先進人類在以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的時代所提出來的巨人，則他們不過是侏儒。

在歷史上第一次，人民大眾底領導者依據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底科學認識底基礎上。

一切過去的傑出人物在自己的預見上只能依靠自己的敏感，自己的經驗的智慧，自己的個人的經驗。他們不知道亦不能夠知道社會發展的規律。他們的預見的能力必然地被限制於不大的時間，和不大的距離中。

以馬克思主義爲領導，我們的領袖和導師，列寧和斯大林在幾十年前預見着事變底進程。以卓越的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武裝着，他們用清晰的目光遠遠地向前看，照耀着千百萬勞動羣衆走向光明的將來，走向共產主義去的運動底道路。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勞動羣衆以新社會底自覺的創造者的作用出現於歷史舞台上，這個新社會是勞動者以自己的手並爲自己的利益而創造的。

\* 與德國作家愛彌爾·路得維希的談話，第四頁。

在一切過去的革命中勞動者會以歸根結底決定鬥爭結局底羣衆力量而出現。可是在事變底表面上的會是不大的統治的剝削階級底階層。一切過去的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也在內都是這樣的。資產階級革命會假手於農民確立了資產階級底政權。在這些革命中勞動者起了台脚底作用，其上活動着資產階級所提出的英雄。

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勞動羣衆自己爲着自己建設新的社會制度，永遠地消滅人剝削人及一切剝削者。正因爲如此，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勞動羣衆是歷史發展底直接的和積極的担当者，它的覺悟的創造者。

「把領袖看做——斯大林同志說——歷史底唯一創造者，而把工人和農民看做一錢不值的時候，早已過去了。現在，民族和國家底命運不自由領袖來決定，而且首先和主要地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決定的。工人和農民無聲無響地建設着工廠和製造廠，建設着礦井和鐵路，建設着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創造着一切生活資料，以衣食供給全世界——這就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底創造者。」\*

可是正因爲歷史現在由勞動羣衆自己並直接爲勞動羣衆自己而創造着，正因爲這樣，勞動羣衆底領導者、人民底領導者應該具有前所不能有的氣魄，和滿足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嚴格要求。

「選舉人，人民應該要求自己的代表們始終執行自己的任務，要他們在自己的工作

中，不墮落為政治上的庸人，要他們始終不愧為列寧式的政治家，要他們成為像列寧一樣的清清楚楚和確定的人物，要他們像列寧一樣奮勇作戰和無情對付人民公敵，要他們在遇着艱難，看見什麼危險的時候，能够像列寧一樣，沒有任何害怕或類似害怕的心理，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從各方面考慮問題，周密計較問題底正反各方面的時候，能够像列寧一樣明哲與鎮定，要他們像列寧一樣忠誠和純潔，要他們像列寧一樣鍾愛自己的人民。」\*

這便是在我們蘇維埃條件下，向領導者所提出的嚴重的要求。

列寧和斯大林在自己身上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度底每個社會活動家所應有的人民大眾領導者底一切特點。

我黨底一切活動家，社會主義國度底每個社會活動家應力求成為列寧——斯大林式的活動家。他應該知道社會發展底規律和經常地與羣衆聯系着。對於列寧——斯大林式的活動家，目的應該明白和確定。他應該在戰鬥中毫不恐懼，對人民之敵絕不調和。只有這種活動家才能在社會主義的歷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並在人類歷史往前發展中，在為共產主義鬥爭的往前的歷史中起相當的作用。

在聯共（布）中央「關於宣傳工作底進行」一決議中說，直到最近對於關於人物在

\* 斯大林：關於最高蘇維埃選舉之演說，第二二——二三頁。

歷史上的作用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還有庸俗化和社會革命黨式的曲解。這表現在，在舊的黨史課本中在個別人物活動底周圍敘述黨底歷史。在這些課本中沒有揭露社會發展底規律，不說到先進的思想，而主要地是說，誰做了什麼？誰從充軍跳脫了幾次，誰坐了幾次牢。這樣，歷史就變成了傳略。從這類敘述中，黨史浸沉於社會革命黨的精神中。如果相信這些課本，那麼歷史不是羣衆、不是人民創造的，而是個別人物創造的。

托派和布哈林派特別企圖傳播這種社會革命黨的傾向，這些法西斯的走狗在自己的脚下失去了歷史的基地。他們感覺到人民不追隨他們，不擁護他們，人民反對他們而日益墮落到社會革命黨底觀點上去了，認爲不是人民創造歷史，而是個別的人物創造的歷史。

人民之敵造成了凱旋式的喧擾，虛僞的慶祝，彼此恭維，稱自己而非人民爲經濟建設底功臣。人民之敵蔑視人民，將人民和個別人物對置起來。他們儼然以爲他們在歷史上起了某種作用，人民是爲他們而存在的，並且他們可以任意處置人民。

在黨史教程中寫着，這些可憐虫以爲他們創造着歷史，忘記了他們只是一時地在蘇維埃國家機關中服務，只要蘇維埃人民手指輕輕一動，就可以把他們趕走。

我們的蘇維埃社會走上新的發展階級——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和逐漸過渡到完全的共產主義的階段。

我們開始創造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爲統治原則的社會。我們有着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底一切條件。

共產主義是這樣一種社會，其中最後地消滅了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底對立。共產主義社會是這樣的社會，那裏每個人都是知識分子，這社會由工程師、醫生、農業專家、演員、教員及工業、農業、文化領域中別的許多高度熟練的專家組成的。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將創造出爲個人全面的和協和的發展所需的一切條件。科學、藝術、文化、技術將達到發展底極高水準。

共產主義社會將把社會生活建築在科學的基礎上。在這個社會中傑出人物底作用並不消失，相反更加增漲起來。在共產主義之下傑出人物將起極主要的作用並受到愛戴，因爲他們將給社會以極大的益處，他們將促進新的和更新的成功底獲得。

唯一正確地解決關於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的是說明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馬列主義的理論。





## 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作用

B·伯那丁涅

「從前曾將領袖認為是歷史唯一的創造者，而不把工人和農民計算在內，這個時期已經過去了。民族和國家底命運，現在不僅僅是由領袖來決定，而首先和主要的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決定。工人們和農民們無聲無響的正在建設工廠和製造廠、礦井和鐵路、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創造生活底一切財富，以衣食供給全世界，——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底創造者。」（斯大林）

馬克思以前，在解釋歷史底領域內，為唯心論所支配着；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和社会學家，在他們研究歷史事件中，只是考察歷史人物行動底思想動機，——而沒有抓住客觀的規律性，沒有揭露這些動機底物質基礎；他們把重心放在歷史上個別人物底活動上，降低而且往往完全否認羣衆在歷史發展中底作用。

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理論家——這個階級底歷史使命是推翻資產階級底統治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够第一次地給社會生活以澈底的唯物論的解釋，並指出勞動羣衆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的作用。

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內，在解釋社會生活發展底基本規律時，指出：

「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即身為生產過程中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會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生產的那些勞動羣衆底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屢次揭破那些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他們在解釋歷史的過程時，把個別人物底行動提到首要的地位，把他們的行動與勞動羣衆的、人民本身的活動相對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常常宣傳這樣一種觀點，說羣衆底活動本身是阻礙歷史發展底因素。如黑格爾派之一，布魯諾·鮑威爾，他從社會發展底基礎是「觀念」、「精神」出發，他認為爲羣衆所能了解的真理不能推動歷史向前進。黑格爾派說過：「過去歷史的一切偉大事業，其所以從最初開始就是錯誤了的，而且沒有引起深入內部的成績，就是因爲羣衆都有興趣於這些事業，因爲這些事業引起羣衆的熱烈情緒。或者是這些事業其所以應該得到可憐的結局，就是因爲這種事業所根據的觀念，是這樣一種觀念，就是這種觀念應該是滿足於自己的表面的了解，而因此也就指望羣衆底同意。」\*

馬克思和恩格斯無情地揭破過這種觀點，指出這種觀點底資產階級的本質和反科學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的家族內批評這種觀點時，指出這種觀點是從最反動的、唯心論的意見出發，是從宗教那裏剽竊來的意見。

在神聖的家族內，我們讀到：

「由布魯諾先生所發明的「精神」和「羣衆」底關係，在實際上，不外是黑格爾的

歷史觀底批判的滑稽的完成，而同時，黑格爾的歷史觀又不外是德國基督教教條關於精神和物質，上帝和世界底對立的投機的說法。」\*

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內，揭破民粹派把人們分爲「高級的」、「批判的思想的人物」、歷史的創造者與「消極的」羣衆這種反動的理論。這種觀點曾由民粹派的著名理論家拉芙洛夫發展過。

照拉芙洛夫底意見，人類在自己的存在底過程中，以廣大的大多數人民底貧苦、困難、窮困作代價，鍛鍊出少數天才的人物、「人民之花」、「文明的唯一代表」。照他的意見，這個過程只是由於個別人物的活動來完成。拉芙洛夫說過，「……無論怎樣小的人類底進步，但是這種進步總是絕對的依靠於批判的思想的人物；沒有他們，這種過程無條件地是不可能的；沒有他們力圖擴展這種過程，這種過程是極不鞏固的。」\*\*

拉芙洛夫認爲：只有少數個別人物底小集團，才是歷史的唯一創造者，這個小集團，照他的說法，是由人類「高級的代表」所組成的，他說，這個小集團懂得生活底理想，並趨向於這種理想。照他的意見，至於人民、羣衆沒有能力積極的和自覺的活動。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揭破這種主觀社會學的理論時，解釋說：

「當民粹派認爲大眾是羣衆，認爲只有英雄才能創造歷史並把羣衆變爲人民的時

\* 馬恩全集卷三，第一〇九頁。

\*\* 拉芙洛夫選集卷一，第二二七頁。

候，馬克斯主義者便回答他們說：並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也就是說，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進歷史。」

唯物史觀底出發點，不是從「批判的思想的人物」底幻想出發，而是從物質財富底生產方式決定生活底社會制度出發。因此，社會發展底歷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底歷史，生產方式底歷史。

物質財富底生產，即是說人類底勞動活動，是人類底歷史的和文化的发展底基礎。由此可見，歷史的創造者，首先就是勞動羣衆，他們是社會物質財富底創造者，是社會底最重要的生產力。

「這就是說，歷史科學假如想成爲真正的科學的話，那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底歷史歸結於皇帝和將軍們底行動，歸結於國家底「勝利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應當首先研究物質財富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人民底歷史。」

在建築在敵對的生產方式上的社會內的生產關係，帶着階級的性質。奴隸佔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底整個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制度，爲社會鬥爭所浸透。

恩格斯說，在階級社會內，社會生活底整個現象，「無論他們表現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學的領域內，或是在其他的思想領域內，在實際上他們都只是社會各階級底鬥爭

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

列寧在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增加到「人民」這一概念上去時，他屢次指出過：馬克思主義過去和現在都是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濫用「人民」兩個字作鬥爭。

列寧說，革命的社會民主派要求：

「使得不能用這兩個字來掩蓋對於人民內部階級衝突底不瞭解，它（革命的社會民主派——譯者）無條件的主張無產階級政黨有完全的階級的獨立性之必要。可是，它把「人民」分解為「各階級」，不是爲着使得先進階級故步自封，用狹隘的圈子來限制自己，用考慮到世界上的經濟主人翁不離開革命來束縛自己的行動；而是爲着使得先進階級不受中間階級底不徹底性、不堅定性、不堅決性的連累，更加努力的、更加熱情的爲全體人民的事業而鬥爭，領導全體人民而鬥爭。」\*\*

人民羣衆底鬥爭，被壓迫的階級反對他們的壓迫者：奴隸反對奴隸主的鬥爭，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無產者反對資本家的鬥爭——它本身就是有階級的社會經濟形態底歷史發展底基本內容和動力。武裝起義，被壓迫階級反對剝削者的革命，它本身就是有階級的社會發展歷史底最殘酷的社會鬥爭形式和最重要的關節。

有階級的社會經濟形態底更替，是經過革命來進行的：

\* 馬恩全集卷三，第一三二頁。

\*\* 列寧全集卷八，第一〇三頁。

「在新的生產力成熟了以後，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統治階級，就變成那種「不可克服的」障礙，而爲要把這個障礙從道路上掃除，就只有經過新的階級底自覺的活動，經過新的階級底強力的行動，經過革命，才可做到。」

正是經過羣衆底革命鬥爭、革命階級底革命鬥爭，來完成從一個社會制度過渡另一個上去。

在古代羅馬，奴隸的最大的暴動，開始於紀元前第二世紀。在紀元前一九九年，在羅馬城郊發生奴隸的暴動。過後不久幾年，在愛杜魯里亞發生奴隸的暴動。在第二世紀下半期，在西西里亞發生最殘酷的和人數最多的暴動。在紀元前一三七年，開始了第一次的西西里亞的奴隸暴動，組成包括二十萬人的軍隊。在最初的戰勝奴隸主之後，曾經企圖組織奴隸底獨立國家。在小亞細亞，一三三——一三〇年，發生過阿里斯唐尼克指揮之下的暴動。暴動者稱自己爲「太陽派」即「天國」之公民，「天國」就是他們的理想。在七三——七一年發生了有名的斯巴達的暴動，包括着十二萬人的軍隊。在這個將軍領導之下，——馬克思稱他爲真正的「古代無產階級底代表」，——奴隸底軍隊給了精練的羅馬軍隊許多慘酷的失敗。西西里亞的暴動，斯巴達的以及其他發生在羅馬帝國的暴動，給了奴隸制度以堅決的打擊。斯大林指出，「奴隸的革命消滅了奴隸主，並取消了對勞動者奴隸的剝削形式」。但是，奴隸不能夠創造新的生產方式。代替奴隸制度而起的，是農奴的剝削形式。

整個中世紀充滿了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這種鬥爭，在各個國家所發生的騷動和暴

動中，獲得最明顯的表現。如在第三世紀，在加里亞的「巴高特」的運動（巴高特即鬥爭者的意義）。後來在西班牙亦發生暴動。在一三五八年發生了有名的法國的農民暴動，被稱之爲「舍克里亞」（舍克里亞即十四世紀法國農民革命之稱）。在英國一三八年發生巨大的農民暴動，在德國一五二五年發生農民戰爭。在俄國十七世紀初在波洛特尼科夫領導之下發生了農民暴動，在十七世紀末在拉辛領導之下發生農民暴動，在一七七三——七四年發生普加威夫底暴動。

恩格斯在說到資產階級革命底動力是什麼時，他指出過，「在三次資產階級大革命中（十六世紀的德國革命，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革命——作者註），農民供給了戰鬥的軍隊，可是在勝利之後，農民却反因這一勝利的經濟結果而趨於破產。克倫威爾之後的一百年，英國的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就消滅了。可是這些小土地所有者與城市平民分子，正是幫助了資產階級，使其鬥爭能夠達到澈底的結果，並將查理士第一推上斷頭台去。」\*

恩格斯在敘述法國的革命時，他着重地指出「有產者在這一次，也如同往常一樣，對於堅持自己的利益，是太畏縮了；從巴斯蒂獄暴動開始時起，平民分子就應當要完成了自己的整個工作；後有七月十四日、十月五——六日、十月十日，九月二日等等，平民分子的干涉，舊的制度確定地戰勝了資產階級，與貴族聯盟合作鎮壓了革命，這樣一

\* 恩格斯：論歷史唯物論，馬恩全集卷一，第三二二頁。



來，也就只有這些平民分子完成了革命。」\*

列寧關於同樣的情形也說過：「事實證明，只有農民和無產階級的干涉，「城市的平民分子」才能够嚴重推動資產階級革命向前進。」同時列寧着重指出，「如果對於十六世紀的德國、十七世紀的英國、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能够放在首要地位，那末，對於二十世紀的俄國，無條件的必須把關係顛倒過來，因為沒有無產階級的發啓的領導，農民是沒有什麼的。」\*\*

英國的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大的真正羣衆的、政治上已形成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列寧）憲章運動證明，民主的最大的收穫之一——普遍的、平等的選舉權，不記名投票——是經過羣衆反對壓迫者的鬥爭而達到了的。

有名的六條憲章寫着：賦予一切成年男子以選舉權，在選舉時必須劃分全國爲十一個居民數量相等的區域，國會議員每年選舉一次，不記名投票，國會議員領得一定的薪水，廢除對國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限制。召集過的憲章運動的羣衆大會到會人數，以及在要求實現憲章的文件上簽名的數量，都表現出憲章運動是羣衆性的，它是真正的羣衆的、人民的運動。

在一八三八年，在格拉斯哥一個羣衆大會上，到會的有二十萬人。後來又在曼徹斯

\* 恩格斯：一八八九年二月二十日給考茨基的信。

\*\* 列寧全集卷一二，第二二頁。

特、北明翰、牛克斯特爾等處召集過羣衆大會。在北明翰召集二十萬人的大會，鄂康諾和阿特屋都在那裏發表演說。阿特屋說：「在請願書簽名之後，五十萬公民大家跟我到倫敦去向國會呈遞請願書。」憲章運動的著名的宣傳家斯提芬士有一次在羣衆大會上說：「如果人民的權利被輕視，那麼就打倒皇帝，打倒貴族，打倒教皇，打倒一切宗教，燒毀教堂，消滅一切爵位、等級、地位。」\*

憲章運動的有名的史學家翰墨遲寫道：在秋天，羣衆大會和露天大會開始在晚間舉行，點起火炬，因為白天裏大衆都很忙。在工作之後，勞動羣衆直接赴會（有時候到會的有五萬人），並要求實現憲章。在階特城，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晚間召集露天大會，到會的一萬五千人，斯蒂芬士在那裏發表了演說。

照國民會議的決議，——英國憲章運動組織底代表會議，——舉行過許許多多的示威遊行，其中在曼徹斯特近郊召集過將近三十萬人。由阿特屋和菲爾登呈交國會的請願書有一百二十八萬人簽名。

請願書底基本內容就是要求普選權。在一八四二年重新召集憲章運動的國民會議時，簽名在請願書上的有三百多萬人。

因此，憲章運動指出，無產階級爲實現普選權，而進行了怎樣偉大的、英勇犧牲的和困苦的鬥爭。集會結社權，罷工權，言論出版權，——所有這些權利都是由人民在他

\* 米叔葉夫：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史，第一二五頁。

們堅決的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所得到的。

在俄國，人民羣衆在許多的年代內進行了反對剝削者的鬥爭，只有在無產階級底領導之下，人民才能够克服了地主和資本家。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指出，列寧從二十世紀初新的歷史條件出發，他說：「無產階級成爲資產階級革命底領導力量，資產階級被排除於革命領導之外，農民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

列寧在說到一九〇五年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所表現的是什麼時，他把俄國革命與葡萄牙的和土耳其的革命相對立，他說：

「反之，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它沒有獲得像葡萄牙的和土耳其的革命一時所得的那樣「燦爛的」成績，可是，無疑的，它是一個「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因爲人民羣衆、大多數的民衆、在重重壓迫和剝削之下的、最深的社會「底層」的民衆，獨立的起來了，他們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企圖，在已崩潰的舊社會底廢墟上，按照自己的利益來建設新社會的企圖，影響了革命的整個行程。」\*

事變的進程，一九〇五年革命底準備和進行，指出人民在革命中特別的作用。一九〇一年五月彼得堡奧布哈夫兵工廠工人發生了武裝的暴動，這就是有名的「奧布哈夫的防衛線。」

\* 列寧全集卷二二，第三九六頁。

一九〇二年在斯大林同志底領導之下，在巴士姆發生了政治示威。在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發生的示威遊行，參加的人將近有六千人。一九〇二年，在頓河上的羅斯托夫發生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是由非法的有組織的會議所激動起來的，參加這次罷工的有數萬人。列寧關於羅斯托夫的罷工說：

「我們在這種事件中看得很清楚，就是全民武裝起義反對專制政府不僅在革命者的觀念中和政綱中成熟着，而且也是運動本身必然的、實際的、自然的、接着而來的步驟。」\*

一九〇三年夏季，在俄國南部有兩萬以上的人罷工。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巴古城的工人發生了罷工，這次罷工「成爲全俄一月——二月的光榮的發動的信號」。（斯大林）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罷工運動的增長，甚至在官場的統計內，也可看出下列的數目字：在一九〇〇年包括罷工的企業一二五個，罷工的工人二九八九人；在一九〇一年包括罷工的企業一六四個，罷工的工人三二二一八人；在一九〇二年，罷工的企業五五〇個，罷工的工人八六八三二人。在實際上，罷工的企業和罷工的工人要多得多。在這些年代內，農民運動可由下列的數字來說明：在一九〇〇年農民的發動會是四八次，一九〇一年——五〇次，一九〇二年——三四〇次，一九〇三年——一四一次，一九〇四年——九一次，一九〇五年——六七〇次。在一九〇五年一月的屠殺後，在一

\* 列寧全集卷五，第二〇九頁。

月一個月內罷工工人的數目達到了四十四萬人，即是說，比整個過去的十年還要多。在俄國一九〇五年五月的罷工，參加的工人二十萬以上，伊凡諾夫——伏茲涅辛克工人的罷工，繼續兩個半月之久，參加的人將近七萬工人。一九〇五年秋季，有一二二個城市和地區捲入罷工。十月中旬只在鐵道上就有七十五萬工人和職員罷工。

一九〇五年秋季，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縣，捲入農民運動。從一九〇五年秋季後到一九〇六年冬季，搗毀地主的園舍：在沙拉托夫省是二七二處，在坦波夫省——一三〇處，在庫爾斯克省——九二七處，在烏拉爾——二百處以上，在波羅的海邊疆——二六〇處，以及其他各處。在十二月莫斯科發生武裝起義。在一九〇六年有一百萬以上的工人罷工。在一九〇六年上半年將近有沙皇俄國一半的縣捲入農民運動，在同年下半年期有全國五分之一的縣捲入農民運動。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寫了一封給俄國社會民主黨彼得堡委員會的信，在這封信內列寧用典型式的明確性說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武裝起義的學說。列寧在揭破布朗基主義對於陰謀問題的提法時，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與布朗基主義的根本區別在那裏。如果布朗基主義的看待武裝起義如同是陰謀一樣，那麼，馬克思主義教訓着：武裝起義應當，第一，依靠先進階級，第二，依靠民衆的革命高漲，第三，依靠在這樣一個轉變的時機，就是在民衆底先進隊伍內整個的更加有力的積極化，在敵人的陣營內更加厲害的動搖。

列寧的關於革命形勢的學說，指出革命形勢底必要的特點，就是羣衆的革命積極性

極度的高漲。同時，列寧指出，從革命形勢發展爲革命，只有當客觀的變化再加上「革命階級底主觀力量能作革命的羣衆行動」時。

「革命——在該字的狹義的、直接的意義上說——恰恰就是民衆生活中這樣一個時期，就是對奧拉莫夫（哥薩克的警官，野蠻的拷打被捕的革命家——作者註）輩底壓迫百年來所積蓄的怨仇，已經表現在行動上，而不在口頭上了，且已經表現在千萬民衆底行動上，而不在個別人物的行動上了。」

斯大林同志解釋在十月革命時領導人民羣衆底布爾塞維克黨的作用和意義，指出十月革命的整個準備工作是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下所進行的，他說：

「爲要完全說明當時的情形，我們還得要研究以下的問題，就是：布爾塞維克怎麼能夠和爲什麼能夠將自己黨的口號變爲廣大羣衆所接受的並推動革命前進的口號，布爾塞維克怎樣能夠和爲什麼能夠不僅使工人階級先鋒隊，不僅使工人階級大多數，而且使大多數民衆確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政策。」

「要知道，爲要使革命勝利，——如果這個革命是真正民衆的和包括着廣大羣衆的革命，——只是黨的口號正確，還是不夠的。要革命勝利，還要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即是：要羣衆自己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確定這些口號是正確的。只有在這個時候，黨的口號才能成爲羣衆本身的口號，只有在這個時候，革命才能成爲真正民衆的革命。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策略的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能夠正確的決定某些道路和轉折，這些道路和轉折自然把羣衆引向黨的口號，可以說引向革命的門口，這樣就使羣衆

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捉摸、檢驗、證明這些口號的正確性。」（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

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內，人民羣衆底創造力，獲得它自己更加完全的發展。由於熱情，由於特別的積極性，由於潛藏在人民羣衆中這一切力量和天才的發展，我國從經濟關係上是農業的落後的國家，變成了強大的工業的社會主義的強國。

列寧——斯大林底黨，在引導蘇聯人民走向共產主義底山峯時，它依靠那種潛藏在革命民衆本身內的用之不盡的潛在勢力和潛在能力、強大的創造性底來源。

列寧教導過，「生動的、創造的社會主義，就是人民羣衆自己的創造。」紅軍堅持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摧毀了在技術方面佔數倍優勢的白黨底和外國干涉者底軍隊。紅軍之所以勝利了，因為它的領導核心是布爾塞維克黨，它的黨員是手拿武裝保衛革命成果的第一線的戰士，因為它是以世界革命底偉大戰略家——列寧和斯大林爲領導。決定紅軍勝利的最重要的情況，就是紅軍是從人民內部產生出來的，爲人民羣衆所擁護所鼓勵。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內着重指出：

「紅軍之所以勝利了，是因為它始終一貫的忠實於和忠誠於自己的人民，正因為如此，所以人民就愛戴和擁護它，認爲它是與自己血肉相聯的軍隊。紅軍是人民底產兒，而如果它像兒子忠實於自己的母親那樣忠實於自己的人民，那麼，它就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它就應獲得勝利。而那反對自己人民的軍隊，則應遭失敗。」

在清除蘇維埃領土上的反革命力量之後，蘇聯的人民開始進行了恢復工作，後來又進行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造工作。在這種工業和農業底恢復和改造中，蘇聯人民表現了勞動的英雄主義的奇蹟。真正的愛好勞動，仇視舊的、地主的和資本主義的制度，準備將自己的全部力量貢獻於建設着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這就證明了絕對大多數蘇聯人民的特點，這就是蘇聯取得有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底決定條件。

列寧教導過，必須相信人民底創造力，必須發揮普遍的隱藏在人民中的天才。列寧說：

「瞧一瞧勞動人民的內部、羣衆的內心，在那裏沸騰着組織的、創造的工作，在那裏湧現復興的，由革命而光明的生活。」\*

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廣大的範圍完全的證實了人民底偉大導師底話。只有在蘇維埃的條件下，在社會主義生產的條件下，那裏，每個勞動者血肉相關地有興趣於發展整個國民經濟，才有可能出現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競賽。

從十六次全蘇聯共產黨代表會議號召一切勞動者加入社會主義競賽，爲執行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起，今年已經是到了第十週年了。勞動羣衆熱烈的響應這一號召：在工廠和製造廠內，在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內，在機關和企業內，成千的工人，集體農民，知識分子爲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加入到這個偉大的競賽中來，社會主義競賽真正成



爲了人民的運動。「突擊隊」這一個字在人民中成了光榮的東西。成萬的人們成爲突擊隊員，他們貢獻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熱情，自己的創造的怒潮給社會主義建設底偉大事業。社會主義競賽使得人們對勞動的觀點也產生了根本的轉變，把勞動變成爲光榮而英勇的事業。在奴隸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形態的長期內，勞動成爲沉重的負擔，因爲這種勞動是爲剝削者而勞動。只有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內，勞動變成了光榮的社會活動。

由於社會主義競賽有力的發展，由於它變爲了人民的運動，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底事業中我們就能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斯大林同志在分析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時，他指出勝利所依靠的條件：

「這首先是成百萬工人和集體農民的積極性，自我犧牲、熱烈情緒、和主動作用，這些工人和集體農民，同工程師及技師一塊兒發揮巨大的精力去發展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如果沒有這種情形，我們就不能達到目的，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這是毫無疑義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

斯大哈諾夫運動——斯大林稱爲現代的不可征服的運動，——它本身顯示着社會主義競賽進一步的發展及其新階段。這個運動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事業上，它本身就表現着是一個巨大的步驟，它準備着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底條件，並引導到消滅勞心與勞力之間底對立，它是從人民本身內部產生的，它是人民創造力底有意義的表現。

「一望而知的事實，就是這個運動是自行開始的一個運動，幾乎是自發開始的，由下層開始的，並沒有受到我們企業的行政人員方面的任何督促。」（在第一次全蘇斯大哈諾夫者會議上的演說）

斯大哈諾夫、布叟金、克里房洛斯、古多夫、登琴科、安格林娜以及其他的斯大哈諾夫運動的創始者，都是全國聞名的人物，真正的人民的英雄。他們從人民中出來的，全蘇聯的人民知道他們，珍貴他們，他們在勞動生產的領域內，把自己的成果呈獻給全蘇聯人民。斯大哈諾夫運動者就是那些模範地掌握着技術，改善勞動工具，把社會主義生產過程合理化的人物。在幾千年的期間內，創造力和體力勞動都是被分離了。斯大哈諾夫運動消滅了這種分離。突擊的工作與整個生產機關的合理化聯結起來，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與發明和改善勞動工具聯結起來，工人階級的文化技術水準更加提高，並同時地提高到工程師技師工作人員的勞動水準。因此，從人民內部產生的斯大哈諾夫運動，本身就是全蘇聯人民改造整個經濟的和文化的生活底有力的策源地。

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中，人民羣衆作用底明顯的證據，就是在十月革命後發明事業廣大的發展。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按照技術發展的水準和由新的技術所產生的工業生產的充足，我們的工業是佔世界第一位，我們工廠和製造廠內的工人和工程技術人材的發明工作，在這種有歷史意義的與資本主義底競賽中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我國，發明工作成爲羣衆的現象，數十萬的勞動者加入到發明工作的事業中來。還在一九三四年，全蘇聯發明家協會就已有七十萬會員。在一九二五年，捷爾任

斯基所發佈的訓令中，就確定指出我國產生羣衆的發明工作的那些原因。

「從生產手段轉入到蘇維埃的工農政府手裏起，在工人前面就開闢了完全新的可能來利用潛藏在工人中的發明能力。我們爲改善勞動工具而工作，他們懂得，在現時他們不是爲加強他們自己的敵人——資本家的優勢而工作，他們不是給資本家以新的工具來加強剝削工人，相反的，他們是給自己的國家，自己的階級以可能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所生產的財富的總和，節省繁重的勞動，改善勞動者的狀況。」\*

捷爾任斯基的這些話，爲我們蘇聯千百萬勞動者所接受，下列的數字可以說明：在沙皇俄國的那個時候，發明證書的最高限度數字是在一九一三年——在這一年發明證書是五、四〇〇件——，以後就降低了，在蘇聯一九三二年發明證書是二〇、八三六件。這這裏重要的是着重指出，已登記的發明在實際上成功地採用。按照三個人民委員會，——重工業人民委員會，交通人民委員會，輕工業人民委員會，已登記的發明底數字中，被採用的：——在一九三〇年是百分之七一，一九三一年是百分之六二，一九三二年是百分之七〇。從這些被採用的建議中獲得經濟的節省，在一九三〇年是四八、四〇〇千盧布，一九三一年是一七九、六四八千盧布，一九三二年是二四〇、四八六千盧布。

在一九三四年發出的特許專利證書和著作權證書底數量達到七千件。

舉幾個例子，說明在蘇聯發明工作底羣衆的和民衆的性質，機器工會托洛米莫夫在

\* 引自斯米諾夫：蘇聯的國外的發明工作，第一四——一五頁。

鐵路運輸上工作三十八年。在革命前他開始自己的發明工作，但是沙皇的官吏無恥的偷竊他的發明，或者是不給他有實現這些發明的機會。

只有在十月革命後，對托洛米莫夫在發明工作的範圍內有效果的工作才出現了機會。托洛米莫夫的發明，在改造鐵路運輸業的範圍內是有大的意義。因為卓越的功績，蘇維埃政府償給他列寧勳章。特別有意義的，就是他與自己的兒子——鐵路工程師——一塊兒為以後的發明而工作。

交通人民委員會的科學技術實驗院的院長，他是發明家，得有勳章，他說：「當我成日成夜地深思和改進我自己堅持的、堅定的、創造的勞動中所產生的發明時，一些什麼情感支配着我呢？這些情感可以用幾句話來說明：愛自己的祖國，愛黨，愛蘇維埃的人民，愛斯大林領袖。」

只在一個斯大林汽車製造廠，發明家和合理化家達到三千五百人；在兩個五年計劃的期間內，合理化的建議書和發明給了三千萬盧布的節約。僅僅在一九三九年三個月內收到一萬九千個合理化的建議，這些建議的實現，可以使工廠節約一千四百萬盧布。鐵匠阿爾洛夫，他在這個工廠的十七年工作中，提出將近一五〇個合理化的建議書。所有這些例子，指明在改造我們整個國民經濟中，在我們這裏帶有羣衆的、人民的性質的發明工作是起了特別的作用。

可是，不僅在提高勞動生產率與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底技術改造的範圍內，而且在列寧——斯大林黨底領導之下所進行的對管理我國的整個工作，是由我們社會主義社會

的人民羣衆——工人、農民和知識界來實現的。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寧說：

「我們還有一個「奇異的工具」，迅速地一下子就使我們的國家機關擴大十倍，這種工具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過，而且也不能有。這種奇異的事業，就是吸收勞動者，吸收貧民到管理國家底日常工作中來。」

使用這種「奇異的工具」，就是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底基本內容。

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它就是勞動者包羅萬象的羣衆組織。

斯大林同志說：

「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組織，即羣衆底最民主的，也就是最有威權的組織，它能盡量便利着他們參加新的國家底建設和管理，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爲破壞舊制度，在爲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的鬥爭中的革命毅力、倡導性和創造能力。」

x

x

x

人民是歷史底創造者。這在文學和藝術底發展中也明白地得到解答，人民的創造力，這就是世界藝術天才作品所創造的强有力的靈感力底無窮盡的源泉。優秀的詩人和音樂家從人民的創造力中搜集自己的創作底題材和偉大的典型。可以勇敢地說，沒有那一個藝術的天才，不是感覺他自己的創作是與千百萬羣衆底生活和思想有最深刻的聯系，不是從千百萬羣衆那裏學習對生活底了解。

俄國的偉大作家，他本身是從人民中生長出來的，並供獻自己的天才爲人民服務，

他說：

「人民不僅是創造一切物質價值的力量，他也是精神價值底唯一的和無窮盡的源泉，是在時間上，審美上，和創作天才上都列爲第一等的哲學家 and 詩人，創造了一切偉大史詩，一切人間的悲劇和其中最偉大的、全世界的文化史。」

人類語言底產生，本身是社會的過程，在全人類文化中，按其意義之重要，沒有比得上它的。語言是隨人民底生活而發展，它是人民的創造力和人民的哲學思想的深刻化底最好的指標。任何一個字，已經都是根據於生活現象本身的意義底了解而來的一定的綜合和抽象。每一個句子都是表明對了解過程的關係及其相互滲透底一切的範圍。

語言是人民的知識底寶藏，是它的百科全書，反映人民對周圍世界了解的程度。語言傳達人類經歷底最細微的陰影，人類所能感覺的色、聲、香味底財富。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以後幾年內，列寧空出時間來研究俄國的語言。他有興趣於民間的成語、俗話、故事，他指出對於研究勞動羣衆底期望和趨向，這些東西是有極大的價值。

普式金勸告青年作家研究簡單的民間故事，以便認識俄國語言的特性。雖然在民間的創作中也有幻想，但是在多方面的形式中，最後地深刻地真實地反映出民衆底真正的意見和要求。

拉發格着重指出過，民間的詩，羣衆底作品，是從人民羣衆生活本身中產生出來的。人民在它忍受災難的直接的印象之下，唱出自己的歌聲，並力圖真實地不造作地把它表達出來。格林 (Grinn) 兄弟斷言，說他們在民間歌謠內沒有發現過一個字是虛

偽的，而微克忒·蓋俄（Victor Hugo）宣稱，說在希臘的敘事詩（Ilíad）內沒有遇到一個不可信的性質。由於這種確切性和真實性，口頭文學，較之個人的任何作品都有更大的歷史價值；因此，可以安心地利用這種口頭文學，而沒有被它引入錯誤的危險。

不最仔細地研究保存在人民創作底寶藏內的那些材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歷史知識。普式金說過，民間的詩歌是反映人民固有的特點和人民生活條件底一面鏡子，神話、傳奇、稗史這類材料，雖然是幻想，其中也包含真正的寫實主義核心，反映被壓迫階級反對剝削者底一定的時代和鬥爭。

人類偉大的智慧，常是利用民間的故事來敘述最深刻的思想，用明顯的、典型的例子來表明自己的學說底本質。斯大林同志說到布爾塞維克是不可被戰勝的和強有力的，就是因為它與廣大人民羣衆保持着堅固的不可分離的聯系，他從希臘神話中引了一個典型作比喻，這個典型就是英雄安泰，他之所以強有力的就是他與撫養和教育他的母親——地神保持聯系。

這樣一種典型，由人民創作所造成的，是真實生活偉大的藝術的反映。許多著名的詩人最仔細地來研究這些典型，這並不是空費時間，而有時他們也從這些典型中借用最本質的特點來敘說自己的優秀的英雄。在哥德底有名的著作——浮士德，在莎士比亞底不朽的悲劇中——哈姆雷特和奧特羅，在托爾斯泰底世界長篇名著戰爭與和平中，在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中，在雪伏琴科底著作中——卡捷林娜，這些都是典型，在還沒有被著名的詩人，和作家描寫在他自己著作內以前，這些典型早就由人民的創作所造

成了的。

因此，我們看到，在創造精神價值的範圍內，也是以勞動羣衆的、人民本身的活動爲基礎。

馬克思主義在承認人民在歷史上的決定作用時，它一點也不否認傑出人物在社會生活發展中的作用。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形而上地提出問題：當承認傑出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時，他們否認人民羣衆的作用。

歷史唯物論辯証地解決這一問題：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但同時不否認也不縮小傑出人物的作用，而相反的，說明傑出人物活動的意義。事情在於人民羣衆的利益，當表現爲歷史的必然性時，他決定傑出人物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影響底限度。

歷史唯物論把關於社會的學說變爲科學，同樣也使得最困難的問題——關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問題，可能得到解決。主觀的社會學家斷言，個人按照自己的願望創造歷史，否認歷史規律性底原則，他們從完全脫離歷史的必然性中，從脫離經濟條件和階級鬥爭底發展中，來觀察人們的行動自由。只有通曉辯証法唯物論的觀點，認爲脫離必然性，自由就不能實現，而自由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性，只有這樣，才能了解和確定歷史上傑出人物活動底界限。

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其所以在歷史上起了偉大的作用，就是因爲他們反映了一定的階級底利益、要求、而在當時的歷史時期內，他們的這些要求是進步的。歷史上的偉人，



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一些人，就是他們把人民羣衆的意志的趨向，他們的願望和需要，他們爲根本的改造社會生活而鬥爭的目標和準備，都集合在自己身上。相反的，那些進行反對人民的人，陷入與歷史必然性相矛盾的人，他們的行動已預示着自己死亡。

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內，指出：

「如果傑出人物的觀念和願望竟與社會底經濟發展背道而馳，竟與先進階級的要求背道而馳，那末這種傑出人物就會變成爲無用之物；反之，如果傑出人物的觀念和願望正確表現着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正確表現着先進階級的要求，那他們就能成爲真正傑出的人物。」

無產階級底偉大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向工人階級和整個人民羣衆闡明了在爲解脫資本主義奴役，在爲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中的道路。

列寧和斯大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準備了組織了最偉大的、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根本的改造整個社會生活——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這是真正的人民的革命，這個革命，在這廣大的千百萬爲反對資本主義的和地主的壓迫而鬥爭的農民底幫助之下，由工人階級所完成的。

在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斯大林同志底領導之下，我國的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界把蘇聯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底堅固的堡壘。

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底事業中，我們有世界歷史性的勝利底明顯的指標，就是整個蘇聯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指出過，我們社會主義

社會的特點，就是在這裏再沒有對抗的各階級。現在我們蘇聯的社會就是表現工人、農民、知識界友愛合作的圖畫。而正是在這個共同性底基礎上，就使蘇維埃社會底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蘇聯各族人民間的友誼，蘇維埃的愛國主義這樣的動力，擴展起來了。

蘇聯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在蘇聯人民忠實於自己社會主義祖國的檢閱中，獲得了光耀的說明，如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以及一九三八年六月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中所表現的那樣。

在選舉全蘇聯最高蘇維埃中，投票贊成黨員和非黨員底聯盟的：在聯邦蘇維埃——百分之九八·六，在民族蘇維埃——百分之九七·八，這是蘇聯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統一底明顯的指標。

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向蘇聯領土張鼓峯進攻發生的時候，全蘇聯人民與遠東紅軍的英雄們，抱同一的感覺，同一的意志，這些英雄們在殘酷的戰鬥中保衛了蘇聯的領土，給日本軍閥以致命的打擊。在張鼓峯的戰爭，在蘇聯人民中所得到的那種響應，再一次地證明了蘇聯人民的統一和團結，它忠實於列寧——斯大林底偉大事業。

當莫斯科城底勞動者歡迎蘇聯的飛機師——科金納奇和哥爾登科時——他們在完成莫斯科——美國之間的長距離不着陸飛行之後，回到莫斯科，——科金納奇說：「在蘇維埃實現底條件下，從莫斯科飛到美國，並不是難事。其所以不是難事，不僅僅是自己

的情感，不是的，而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底每一個成員，都用事業、用哥比、用盧布、用手來參加這種工作，來參加這種飛行。這是整個千百萬的蘇維埃人民底飛行。」

用蘇聯人民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來鼓勵蘇聯底優秀的人們，沒有比這句話表白得更

好的。  
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底政策其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它密切地不可分離地與人民的利益相聯系，把人民爲人類光明的前途，爲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的不屈不撓的意志集合在自己的身上。

斯大林同志在「關於黨的工作底缺點」的演說詞內說過：

「只要布爾塞維克保存着他們與廣大羣衆的聯系，那他們將一定是必勝不敗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定律。反之，布爾塞維克只要一脫離羣衆，一喪失自己與羣衆的聯系，一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那他們就會喪失任何的力量而變成空架子。」

其次，斯大林同志從希臘神話中引了一個關於英雄安泰的例子，這個安泰因與自己的母親——地神的聯系，成爲無敵底和強有力量的。斯大林同志說：

「我認爲，布爾塞維克也好像這個希臘神話內的英雄安泰一樣。正好似安泰一樣，布爾塞維克之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為他們與那生育、撫養和教育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維持着聯系，只要是他們與自己的母親，與人民維持着這種聯系，他們將仍有必勝不敗之一切可能。」

「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必勝不敗底關鍵。」